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新年书单

史大于文的文学史

被漠视、孤独不重要，写得好才是唯一要义

在布达佩斯领略“看得见的历史”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庆 言一
夏佑至 扬克 孙骁骥 灵子

轮值编辑

王晓渔

观察员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刘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克（德国·图宾根）
灵子（北京）	吴强（北京）
言一（成都）	朱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设计 刘承周（北京）

2013年12月 第7卷第11期

总第71期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更多即时信息：<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2013年以前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2013年各期精排版“独立阅读”均可在多看阅读免费下载：

www.duokan.com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这期新年特刊，除了常设的书评和随笔栏目，特别邀请“独立阅读”的同人列出2013年的阅读书单，其中既有“所见略同”之处，也有“所见各异”之处。“和而不同”是“独立阅读”所期待的，“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心向往之。

当您读到这一期的时候，已经是甲午年春天，祝新春如意！



目录



书单

005-027

- 戴新伟
- 朱 白
- 朱航满
- 苏小和
- 成 庆
- 夏佑至
- 贾 葭
- 灵 子
- 林建刚
- 王晓渔

书评

028-037

- 凌 越
史大于文的文学史
- 朱 白
被漠视、孤独不重要，
写得好才是唯一要义

随笔

038-054

- 邵浴日
在布达佩斯领略“看得见的历史”



戴新伟

推荐:

王鼎钧:《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三联书店，2013年1月。

理由: 王鼎钧的文章有史家的见识, 有文学家的情怀, 这四部回忆录已经超越了所谓民国范台湾风, 超越了所谓历史真相, 饱含反思和同情。是我在2013年读到的第一种有价值的书, 一直想为这四本书写一篇长文, 名字都想好了: 《大书》。

孙机:《仰观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6月。

理由: 这本书副题是“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我的感受是：读了孙机的文章，就知道目下谈古代名物的人与文章短板在哪里。他把这种可以很玄乎的解释，非常直接、清晰、有用地告诉你，文科课题，理科思维，叹服。希望不是我一个人的读后感。

汪世清:《艺苑查疑补征散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

理由: 汪先生的学术文章，近于从前读书人

的著述，学养深厚，文气充满，比照乱哄哄的《功甫帖》，便可知书画鉴定、文艺批评在目下的缺憾。

[意]帕韦泽《月亮与篝火》，陆元昶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2月。

理由: 我非常喜欢帕韦泽的诗，这本小说也很棒，它的主题是回家，是二战后的意大利乡村。去年秋天在意大利，我问过西西里海边小城书店的老板，问过山区小镇的大学生，他们都能第一时间准确地让你明白这是他们的经典作家。要知道1950年帕韦泽自杀时才42岁。





他的文学成就，桑塔格给了很高的评价。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雨后》，管舒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1月。

理由：一本美妙的短篇小说集，和作者的老乡、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一样精彩，生活的沉痛感，只是特雷弗多了现代社会的雅气。

[加拿大]爱丽丝·门罗：《快乐影子舞》，著作，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11月。

理由：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第一本短篇集，无需锦上添花，好就是好。

[美]托尼·朱特：《记忆小屋》，何静芝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

理由：回忆录我喜欢看：

一、词条形式撰写的，二、关键词撰写的。历史学家朱特的这部回忆录正是后者。他对自己这代人（生于40、50年代，经历了60年代“革命”洗礼，从80年代开始逐渐掌权）有非常清楚、深刻的认识，也许，正是这种反思精神让他成为了左派，但其态度让人敬佩。在我们的社会里，生于50年前后具有巨大的不同，这些人也经历革命的洗礼，也逐渐成为各行业的掌权人物，但是在文化领域要看到有所反思的，太少。

[波兰]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乌兰、易丽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

[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

理由：这两本书是必须推荐的。

[日]小津安二郎：《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会做豆腐》，陈宝莲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5月。

理由：这本书严格说是拼凑的，访谈、日记、报纸文章、发言，但其中小津在中国战场的日记弥足珍贵：不能忘了导演小津侵略者的身份和经历。

丁午：《小艾，爸爸特别特别特别想你》，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3月。

理由：一本泪点很低的书，也是一本格调很高的书。

周涛：《一个人和新疆》，花城出版社，2013年11月。

理由：新疆散文家周涛的口述自传，格外的坦诚，似乎没有哪个当代作家这么开诚布公地谈自己。在资本与权力的平台上，文人作家是最



会开诚布公谈自己的某些方面的,但决不会去谈周涛谈的这些东西。

[意]艾柯:《无限的清单》,彭淮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0月。

理由:我对艾柯的这个主题感兴趣。

[意]毛里齐奥·维罗利:《尼科洛的微笑》,段保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

理由:这是世纪文景出版的传记丛书一本,关于马基雅维里的传记,非常好看、好读,原作者是意大利的一位哲学家。

许礼平:《旧日风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

理由: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是以亲身交往,带出了香港在67暴动时候一些无辜受到牵连的平凡人,从中可以见到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左右政治之风如何操纵了这些人。许礼平作为文化商人,与大陆的书画界大佬过从甚密,所以也有不少历史边角料。总的来说,水份颇大,而且有一股难以去除掉的香港文字味。

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3年3月。



理由:今年集中读了有关晚年张爱玲的一些书,包括几种信件整理,以夏这本文献价值较大。不过话说回来,张粉有很多种,有的就喜欢叨叨叨她的情史八卦(还是以自己的水平加以度量和理解),亦无他法。

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

理由:不论杨奎松此书有多少硬伤,但其在序言中谈晚清民国以来中国读书人“忍不住”的关怀,足以启人良多。

阎连科:《炸裂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



理由：这本书我想该列为“推荐与不推荐之间”。上浮《第七天》二等，但是很难让人衷心喜欢，即使和阎连科自己的小说比，也显得刻露。读这本书，多少还可以从文学中看到我们的社会和现状，读《第七天》就真的是扒拉新闻段子了。

不推荐：

以下书目可以称为“不喜欢”，纯属个人喜好。

木心口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1989—199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理由：木心这部书，陈丹青喜欢，一般读者喜欢，可以接受，那么多作家文学评论家都倒下了，实在让人吃惊（张柠批评木心是少有的声音，但像是为批评而批评，整篇发言一两句关键话，还远远不够）。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三联书店，2013年5月。

理由：似乎写书有个“第二本”定律，难以突破处女作的名声。这本书的人物不如上一本《人有病，天知否》那么典型、有名，材料太多。这次读这两本书，感觉在材料与论证以及同情理解上结合得比较好的，是写郭小川的

那篇长文，所谓的名文如写沈从文汪曾祺的，抒情的水份太多。

朱良志：《南画十六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

理由：我很奇怪，为什么是“十六观”？但这种研究很多人喜欢。

姜淑梅：《乱时候，穷时候》，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

理由：是这本豆瓣上“交口”的书让我想到了两个问题：（一）何谓“个人史”？一般来说，个人经历一些事件，但是对事情没有归纳和分析能力，根本搞不懂判断，何来见识，何来写史？不是你参与了这个历史事件，便可以写出历史来，不是这么回事。（二）大概是史学家邓之诚说的，搜集了很多在历史上偶留踪迹的著作，结果发现多数不值一提，就该是被遗忘的命运。别迷信什么时候突然出现一个天才。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中华书局，2013年10月。

理由：也是“第二本书定律”，很多文章太短了，缺乏容量，没有一定的容量，就是有思想，也是在单腿站立。



朱白

推荐:

赵志明：《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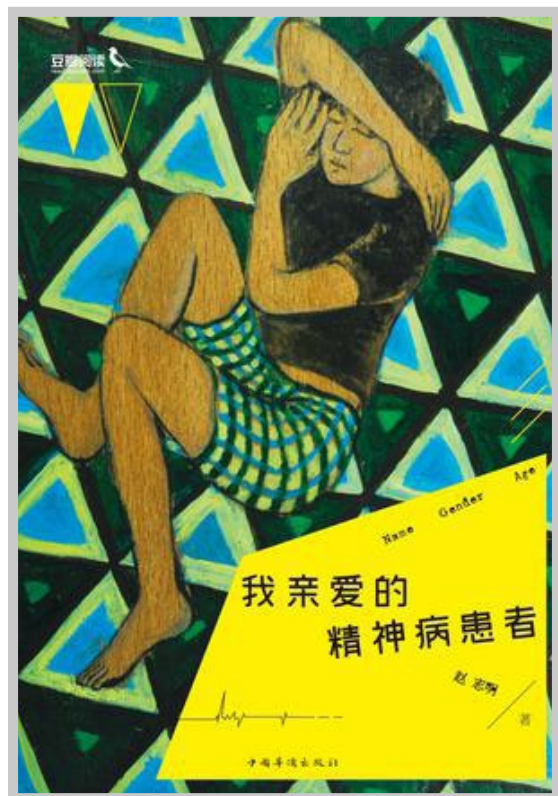
理由：《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确实太好了。这种好甚至不是基于赵志明是我朋友，或者他是什么被刻意埋没这么久的小说家、遭遇到冷漠什么的，仅仅就是绝对意义上好坏的好。

[美]查尔斯·布考斯基：《苦水音乐》，巫土、杨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理由：《苦水音乐》是窥视布考斯基原貌的最佳入门读物，这部短篇小说集不仅揭开了一个底层酒鬼的细腻得足以让人看到他身上跳蚤的世界，也将一种凛冽的充满自由态度的价值观展现无遗。

[美]查尔斯·布考斯基：《邮差》，杨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

理由：布考斯基对生命尤其是自己的生命态度，在《邮差》中昭然若揭，包含着随遇而安和随他去吧的心态，以及极致时的放弃的念头。



[美]威廉·巴斯勒：《瘾君子》，小水译，作家出版社，2013年9月。

理由：是它本身呈现出来的一种漫不经心却又字字有效的叙事风格，以及大胆直接地暴露了真实人生的一种，不管是对生活的猎奇还是对文学的好奇，《瘾君子》都应成为年度必读之选。

[英]基思·理查兹：《滚吧，生活》，董楠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5月。

理由：跟许多可以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一致，



基思·理查兹在讲述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时，没有留下任何虚掩和回避的角落，它们诚实地摆在读者面前，是挑衅也是分享，这不是暴露癖，而是一种靠谱的回忆。

[美]丹尼斯·约翰逊：《火车梦》，兰若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

理由：对于苦难的展示，丹尼斯·约翰逊使用的是克制和简洁的语言，尽管小说中不乏诗意的描写，但粗粝仍然是《火车梦》的特色之一，这种粗粝形成了一种真对自身有效的准确。

于坚：《印度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

理由：于坚的作品中很多让人惊奇的地方，他是怎么做到的，我说的不是摄影师可以在河上拍摄对岸上的人时所选取的角度，而是在加尔各答那些地方，摄影师竟然可以在人看着镜头时按下快门。

[日]荒木经惟：《漫步东京》，阿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理由：独轮车被撇在一旁，女孩爬上一棵大树，张大嘴笑着对准镜头，这不比你为女朋友特意拍的一张“到此一游”更高明，但随之一个模糊甚至画面残缺的背影，或许可以告诉

你，这才是瞬间悲伤的美。

[日]荒木阳子、荒木经惟：《东京日和》，罗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理由：论煽情，这一年看到的文字中没有比荒木经惟纪念自己死去的妻子更厉害的了。

[美]冯内古特《看这儿，照相啦！》，唐建清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理由：冯内古特在为我们提供一单又一单绝望的证据和理由时，依然不忘优雅从容地搞点幽默的段子，他可以让你笑完之后掉下眼泪。

魏思孝：《豁然头落》，随便出版计划，2013年1月。

理由：如果说作家正在通过一系列的底层人物在为屌丝群体树碑立传，那么他自己本人的生命历程就可以作为呼应这个时代脏与乱的一颗珍珠。

[日]森山大道：《森山大道，我的写真全貌》，黄亚纪译，台北：原点出版社，2013年4月。

理由：几乎可以看做是森山大道的一种自我消解，他的观点和行为背后的精神，在一次次对谈中得到了体现。从中也不难看出来，森山大





道在“说”的时候可以理性十足，且充满对异化世界的不确定感，无论是对“挑衅”行为的解释和自己备受争议摄影风格的阐释，都有他个人的非大路货的言说。

[日]森山大道：《犬的记忆》，金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

理由：森山大道说：“尽管很恶心，但是很想哭。那会让你心情矛盾。”这是他评价当时日本走红的一位剧场歌手时说的，我在看《犬的记忆》里的文字和影像时也大多这种感受。

[南非]库切：《耶稣的童年》，文敏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

理由：库切出版此书时已经七十三岁了，在接受国内《南方周末》的采访时也提到“老年人的写作”、“一个人职业生涯黄昏时期的写作”，可是此时或许也应该知道，一个人的心念还真跟年纪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库切的活力不仅仅反应在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创造力依然旺盛，也体现在他的探索性越发强劲和对某种题材的迷恋。

不推荐：

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

理由：《第七天》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悲剧的现实性，而无交织出来的复杂徘徊动荡的悖论性，所以最终《第七天》的形成的最终冲击力只能以孱弱来形容。

阎连科：《炸裂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

理由：《炸裂志》有着一颗深入描写中国近年人心和颠沛社会的野心，但细究之时，它并没有给予指出欲望之河的源头和执着地去洞察这里荒诞的发轫之初，自然对眼下这种“炸裂”之态的形成也就缺乏了更深刻的解读。

[日]青山七惠：《紫罗兰》，竺家荣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7月。

理由：青山七惠没有继续带给她的读者惊喜，而是用一种对于她自己来说老套、重复的内容和节奏，“打发”掉了一次小说创作。

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

理由：通过伪善扭曲的赞美，结果只能丑陋的。正如道貌岸然的小说家会通过所谓的采风 and 深入生活，进而虚构底层民众来完成自己的艺术创作一样，这是虚伪的，更是于艺术来说永远无效的。



注：需要说明的是，这份“不推荐”名单不是“最烂”，很显然作为业余读者，我们都是从自己感兴趣的书看起，至少是有可能感兴趣，“最烂”应该在那些早早就排斥和回避掉的里面，而不是认真看了一遍的这些。不推荐的意思大概是，失望或者不值得一看。



朱航满

推荐:

[美]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13年1月。

理由:此书2013年初由好友推荐,春节期间在网上下载了香港中文大学版的PDF电子书,竟一气读完。于是,又推荐其他朋友。后来有幸去拜访周有光先生,竟在这位108岁的学者书房里也看到了这册大部头的著作。此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傅高义用了他智慧的方法讲述了我们自设藩篱的东西。记得读过一篇文章,内容的大致意思是,漠视政治的人最终将被政治所漠视。我以为读这本书,乃至类似的史书,对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以及所处的时代好处极大。此书出版一周年之际,三联书店在首都图书馆举办傅高义和章百家的对谈,其时正值新一轮的深化改革全面启动之际,千余人的讲堂座无虚席,气氛极热烈。此日,我穿过大半个北京城,终于见到了这位八十多岁的美国老头。

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

理由:此书对于读书人,何须推荐。但对于未



读此书者,我之所以郑重推荐,乃是想说不必为那篇批评其硬伤过多的文章而选择放弃,因为此书初版虽有诸多瑕疵,但终不能掩盖其卓越的学识和才华。记得梁漱溟先生曾自诩是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读杨奎松的这册著作,也有这样的感觉。这本著作中的三篇文章,乃是三个人物,三种背景,三个问题。立意精到,见识鲜明。杨奎松的史学文章,如同老吏断狱,不但带你回到历史现场,而且带你破解历史迷案,曲曲折折,环环相扣,令人拍案。杨奎松以1949年为切入点,也以1949年为分水岭,将革故鼎新前后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予以对照,充满了关怀与体贴。



梁由之主编：《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商务印书馆，2012年11月。

理由：此书三大册，约170万字，作者200人，文章256篇，内容涉及辛亥革命以来各个方面的文章佳作。此文选特点有三：其一是按年度编选，可谓一册百年来思想文化的编年史；其二是每篇文章均撰写有人选理由、作者简介和原载出处，但并非泛泛而谈，乃是言简意赅，别树深意；其三是收录文章皆言之有物，文采见识俱佳，且多为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结晶。我读此书，仿佛可以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得以延续的潜流和脉络，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而每一位作者，每一篇文章，每一种见识，也都仿佛是一个微小的入口，却由此可以进入到一个更为开阔的精神领地。

木心口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1989—199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理由：木心的著作多矣，但我却偏爱他的这册未完成的文学草稿。尽管所读著述，仅为其弟子陈丹青整理的听课笔记，但也可窥识木心的才华和智慧，令我着迷。我读此书，深觉木心在文学、音乐、绘画、书法等多个门类的互相融通，其对于经典的博览与慧觉，对于文学的感触与升华，对于艺术的体验与研究，均达到了老而弥精的地步。我喜读木心的地方还在于，他自觉地将其经受的苦难和孤独冷静而决绝地彻底祛除，只留下他对于文学艺术既热

烈又冷静的爱与沉思。木心有言：“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此可谓其自画像。

《文学回忆录》云霞满纸，妙论迭出，此可谓其精神秘史。





苏小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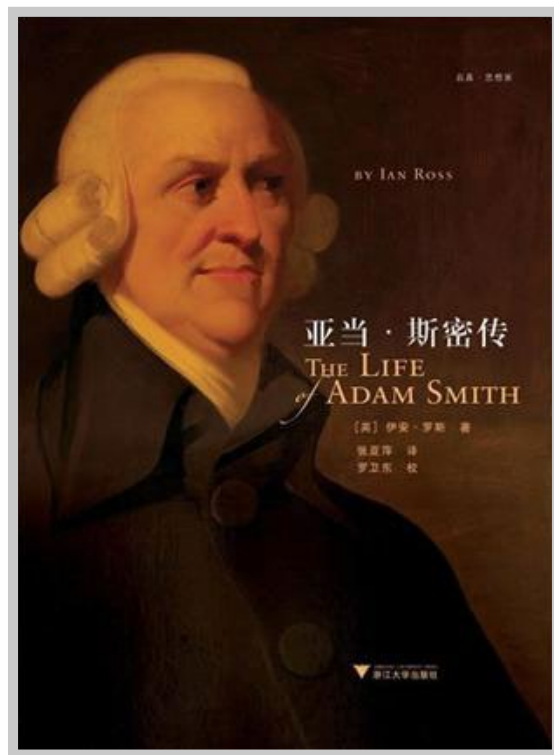
推荐:

何卓恩、夏明编选：《夏道平文集》，长春出版社，2013年1月。

理由：本书虽然经过大陆出版社的严重和谐，但依然显露出台湾一代大知识人的才华与品格。在我看来，夏道平先生做到了三点，第一，接续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学术传统，并将之台湾化，常识化，因而在台湾经济学界构建了稳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文脉与精神。第二，以书生之见，参与到抵抗专制，呼唤自由的行动之中，并取得成就。第三，个人生活最终找到精神谱系，他的信仰让他的生命得以延续。在这个意义上，大陆经济学界的人们不读夏道平，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葡]佩索阿：《阿尔伯特·卡埃罗》，闵雪飞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

理由：我对这本书的汉译本评价很高，认为闵雪飞的翻译，可与艾略特的译者赵萝蕤先生比肩而立。闵雪飞的汉语诗歌能力准确，有深入到诗歌内部的能力。而佩索阿的诗歌，有汉语诗歌历史非常稀缺的深刻的思辨力，有某种形而上的追问，以及这种追问的无力感和虚无感。这样的诗歌，既不同于汉语诗歌表面的



意象和叙事，也不同于艾略特明确的抒情与沉思。他是虚无诗歌写作的典范。

[英]伊安·罗斯：《亚当·斯密传》张亚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

理由：本书不同于约翰·雷的故事钩沉写作，而是完全基于文献的梳理，很好的陈述并分析了亚当斯密在自由市场经济秩序，人类道德秩序和法的秩序方面的体系，让读者意识到，斯密是一个思想的整体，而人们多年以来对他的研究，多数都是单向度的路径。所谓斯密难题，不是斯密没有建设，而是后人的理解力苍白。



不推荐:

钱穆：《中国经济史》，叶龙记录整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月。

理由：经济史是一门专业史，钱穆先生用经史子集的传统方法，失去了经济史的范式分析价值，给人一种浓厚的重农主义经济学的封闭趣味。事实上，钱穆先生强调了他的经济史方法，一种中国式的历史方法，唯物论的经济史路径，加上科学归纳的逻辑。我的失望在于，钱宾四先生忽略了英国工业革命和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变量，事实上以他所处的时代看，他应该是知道这些学术新路径的，但传统的经史子集方法论，将钱穆先生的经济学面相，导向了封闭的区域的缺乏比较优势的方法里。





成庆

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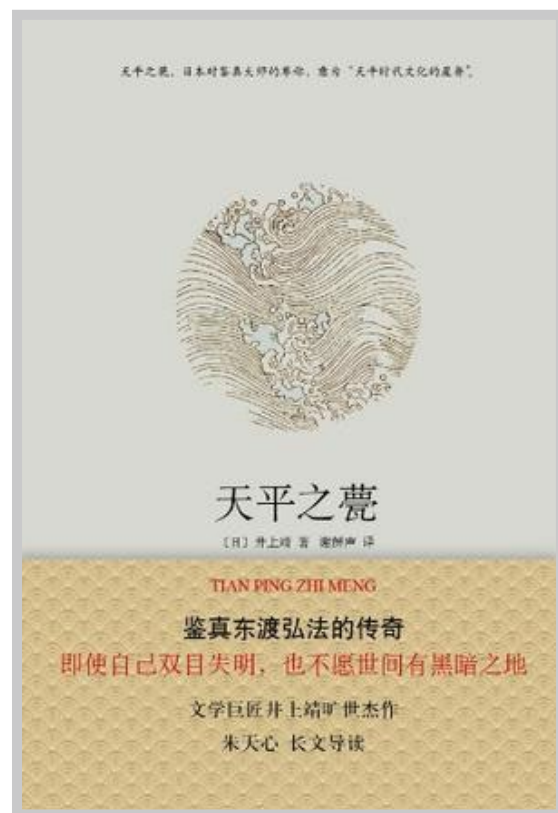
[日]井上靖:《天平之薨》,谢鲜声译,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1月。

理由:去年夏天,我在奈良的唐招提寺鉴真和尚的舍利塔前,看见了井上靖题写的石碑,

“天平之薨”意谓“时代之栋梁”,这是对鉴真和尚之莫高的评价。井上靖为写这本短短的小说,遍阅史料,对那一代求法人的气象与格局有着精微的描述,惜乎此书在此地尽管出版,却无一丝迴澜。

侯坤宏:《浩劫与重生:1949年以来的大陆佛教》,台南:妙心出版社,2012年12月。

理由:1949年之后大陆佛教的劫难在文革中达到高峰,但佛教在文革前的遭遇,以及僧人与居士在那个时代所感受到得步步惊心,却因佛教徒淡于回顾一己之苦难而渐渐湮没于历史风尘之中。这本由台湾学者所写的著作无疑是及时的提醒,让我们知道,传统是如何中断的。





夏佑至

推荐: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剑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反思》，甘会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

理由：克利福德·格尔茨著作两种，充分显示出作者对文学批评和哲学的兴趣。前一本讨论人类学名著的文本，后一本将人类学方法论与哲学思潮做了巧妙的连接。格尔茨以行文复杂多义著称，读译文尤其费力，但即便如此，书中巧思迭出，仍然令人击节。

[西班牙]阿左林：《塞万提斯的未婚妻》，戴望舒译，桑农编，三联书店，2013年9月。

理由：周作人和汪曾祺都极推崇阿左林，但其人其书早已被历史尘封。现在看，受阿左林影响的中国作家里，和他气质最近似的是师陀（这个名字同样早已被历史掩埋）。《果园城记》是师陀对阿左林的致敬之作。

[法]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内心的寂静》，张晓译，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年5月；《思想的眼睛》，赵欣译，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3年7月。

理由：前者是布列松基金会选编的肖像摄影集，后一本是布列松关于摄影和视觉艺术或完整或零碎的思考，包括《决定性瞬间》的著名序言。读者往往因为艺术家籍籍无名而忽略其价值，但艺术家名气太大，读者又会满足于大众传媒塑造的刻板印象，而放弃探究其幽微的旨趣。布列松就是一个例子。

赵川：《激进艺术小史：八十年代上海记事》，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1月。



理由：对1980年代上海美术活动的回顾，与流行的以北京为中心的当代艺术叙事大相径庭。理解历史就像拼图游戏，空白很大，但手上的零片却很有限。这本书是那种早该有但偏偏一直没有的零片。另外，书的品相也值得一提：图版编排合理，印刷效果一流，读来赏心悦目。

不推荐：

[英]迈克尔·苏立文：《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陈卫和、钱岗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

理由：虽说通史都只能叙其大略，但此书细节硬伤较多，译者不得常常停下来费心做注，对阅读干扰甚大。





贾葭

推荐: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三联书店，2010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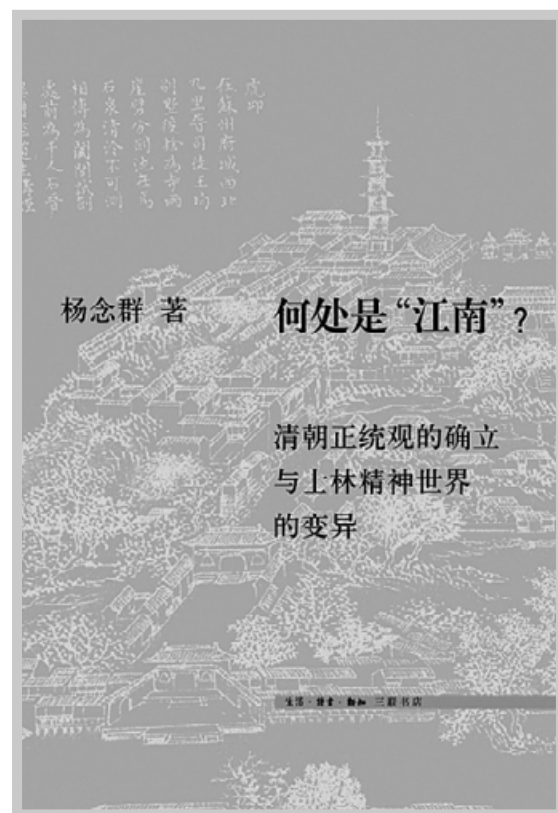
理由：这本是旧书了，但是读得饶有兴味。作者以江南士人为切口，分析明季以来到清中叶“王统”与“道统”的相互关系，分析了在康乾时期道统如何臣服于王统的。当然，此书硬伤颇多，刘铮诸人多有指出。

陈耀昌：《福尔摩萨三族记》，台北：远流出版社，2012年1月。

理由：台湾走向世界，从这个故事开始。

陈芳明：《谢雪红评传》，台北：麦田出版社，2009年2月。

理由：台共与台湾的恩怨，东亚的共产党活动，如何阴差阳错地影响了三、四十年代的台湾。





灵子

推荐:

[英]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

理由：2013年读过的最有趣的新书。作者将现代性归因于英国社会在13世纪在各种必然、偶然因素下碰撞得来的结果，他的人类学背景使得本书更多是在从各种不同方面以生动有趣的故事作为例证，比如英国人的从战争、贸易、现代技术、文化、公民社会、婚姻家庭、游戏、语言、宗教、爱国心乃至对宠物、园艺的爱好等等方面论证，行文也充满着英国人的幽默与“自大”，十分可读。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

理由：没有题目预示的那样庞大与深刻，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也多有躲闪，但是在论述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力量这些年的发展历程上，还是多有敏锐观察和独到见地。

王昭阳：《与故土一拍两散》，中信出版社，2013年5月。

理由：似乎是一本遗珠，在媒体上少见提及。



作者上世纪80年代出国，在华尔街做过投行，后来辞去高新职务，转而在美国、欧洲等地流浪多年，几年前开始写作，内容基本都是围绕身份认同与文化比较，关于究竟从哪里来与到哪里去的问题，关于究竟哪一条路更好哪里才是故乡的问题。答案未见得准确，追问过程却颇可一览。

刘擎：《中国有多特殊》，中信出版社，2013年5月。

理由：作者近年来短随笔的结集，将常见“伪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希望读者能有更多元



和复杂的思考。文笔简洁、逻辑严密，窃以为
是这类文章的典范之一。

**查建英：《弄潮儿》，牟子宁等译，香港：牛
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

理由：岁末年初读到此书繁体本，其中收录了
两篇作者早年为《纽约客》写作、已广为人知
的随笔《国家的敌人》《国家的仆人》，再读仍
然拍案叫绝。下篇写企业家，张大中、潘石屹
张欣夫妇和孙立哲，也时时契合着本书副题，
“中国崛起中的行动者和推动者”。





林建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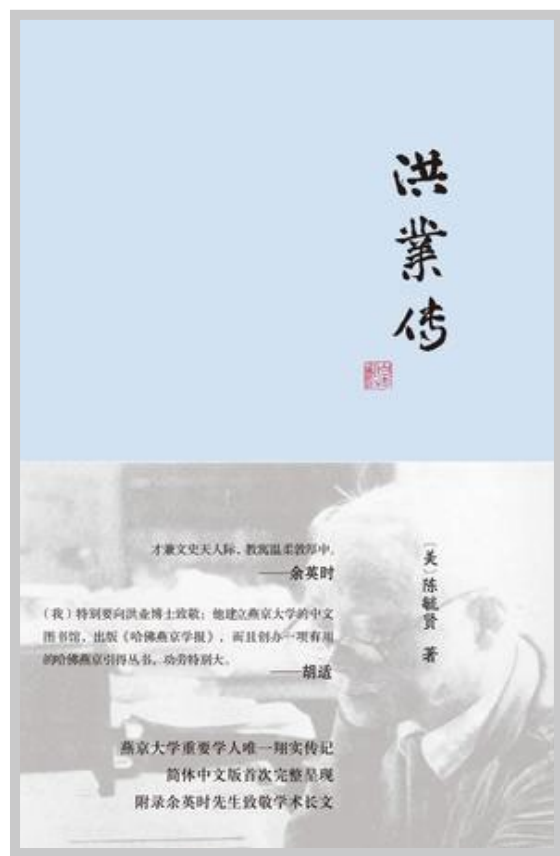
推荐:

何卓恩、夏明编选：《夏道平文集》，长春出版社，2013年1月。

理由：夏道平1949年之后去了台湾，他在《自由中国》时期的政论似又相对低调。因此，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似乎逊色于殷海光，也导致他被大陆思想界的遗忘。《夏道平文集》的出版，大大弥补了这一遗憾。顺便说一句，1950年代的《自由中国》杂志也于2013年在台湾影印出版了，不知什么时候大陆可以影印？如不能影印，出一本《〈自由中国〉文选》也值得尝试。听说范泓先生正操作此事，不知进展如何？当下大陆，用《自由中国》的社论来取代中国报纸的时评，似乎比许多时评家写的还要好呢。

费孝通：《民主·宪法·人权》，三联书店，2013年4月。

理由：这本小册子我花费了几个小时候就读完了。此书是非常好的公民常识性读本。虽是常识，但此书似乎无比契合我们这个时代。由这本小册子，我又想到陈之迈（他在抗战时期似乎也编写过公民课本，可惜至今无缘一见）写的《读书指导》、董时进的《中国农业政策》，



其实这些书都值得重印，值得我们温故知新。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刘志强先生编辑的罗隆基的《人权·法治·民主》（法律出版社，2013年10月），在此一并推荐。

〔美〕陈毓贤：《洪业传》，商务印书馆，2013年2月。

理由：这本书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新政权与洪业之间“勾引”与“反勾引”的故事。1949年之后定居美国的洪业念念不忘留在大陆的文稿，相关部门利用他挂念书稿的弱点呼吁他回国，并承诺他只要回国，不仅书稿归还，



而且还保证生活待遇比肩美国水准。洪业果断拒绝了这样的“好事”，有幸在美国颐养天年得以终老。

最近看《南方人物周刊》，发现洪业似非个案。为引诱傅聪回国，当时的相关部门似乎也做了局，不幸这“阳谋”被傅雷识破。傅雷写信告诉傅聪之后，很快就自杀了。由此我又想到周鲠生、曹聚仁“招降”胡适的往事，这些“勾引”当然都失败了。

李新宇：《旧梦重温——民国先知的道路探寻》，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

理由：之所以推荐此书，是突然发现许多志同道合者并非志同道合，而是貌合神离。作为民国粉，我发现他们粉的并非民国，而是1927年之后的党国，许多朋友还对蒋介石等人夸赞有加。比起1949年之后的那位，蒋介石当然显得温情脉脉。然而，恰恰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最终导致了民国向党国的价值转换。比起青天白日旗，我更喜欢五色旗。本书中的《民国“遗民”章太炎》，尤其值得许多朋友参看。

不推荐：

秋风：《重新发现儒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

理由：实话实说，我一度对秋风先生的主张充满“温情与敬意”。但是，看到他对胡适等启蒙文人的严厉批判之后，我觉得他的许多说法未免太一厢情愿。秋风先生似乎过度美化了那些新儒家的代表，而他将批判矛头指向胡适等人则让人心生疑窦。

跟秋风先生一样，我也非常欣赏周德伟。但我实在不能接受他对钱穆等人的赞美以及他对胡适等人的批判。

秋风先生一直推崇儒家宪政，并对1947年宪法的制定者张君勱推崇有加。然而，1950年代末期，蒋介石违反宪法搞总统三连任的时候，恰恰是身在台湾而又被秋风批判的胡适，竭力维护宪法的权威，明确反对蒋介石的违宪行为。同样是在这件事情上，被秋风先生赞美的钱穆则大力拥护蒋介石做第三任总统。这一历史事实无疑是对儒家宪政的讽刺。

[美]江勇振：《日正当中》，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

我无比佩服江勇振先生收集史料的能力。但他的胡适传充满了为解构而解构的味道。其论述胡适为了争夺文化霸权而不择手段的故事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胡适的形象，但这种颠覆在多大程度上合乎历史事实，似乎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外，江勇振对胡适肛门偏执的描述，让人觉得不太合乎常理。在我看来，痔疮是一种常见病，胡适家族中好多人都患有此病，胡适将自



己的病情告诉好朋友，不过就是让朋友放心而已，除此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江勇振先生“不疑处有疑”的精神很可贵，但未免猜疑过度，许多地方近乎于臆测了。例如，本书上卷江勇振利用杜威的档案，叙述了一个北平知识分子的家庭环境，在没有证据证明那就是胡适的家的时候，江勇振就理所当然的做了大胆的假设。这未免有“假设有余，求证不足”的毛病。





王晓渔

不推荐：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13年1月。

理由：傅高义先生过于熟悉中国国情，以至于认同了中国国情。他先后撰写和编辑过“日本崛起”（《日本名列第一》）和“韩国崛起”（《朴正熙时代》）的著作，此次进军中国，颇有“一鸡三吃”的驾轻就熟。这本书的畅销，并不让人意外，时政题材的严格准入制度，使得这本书在几无竞争的情况下于市场上获得完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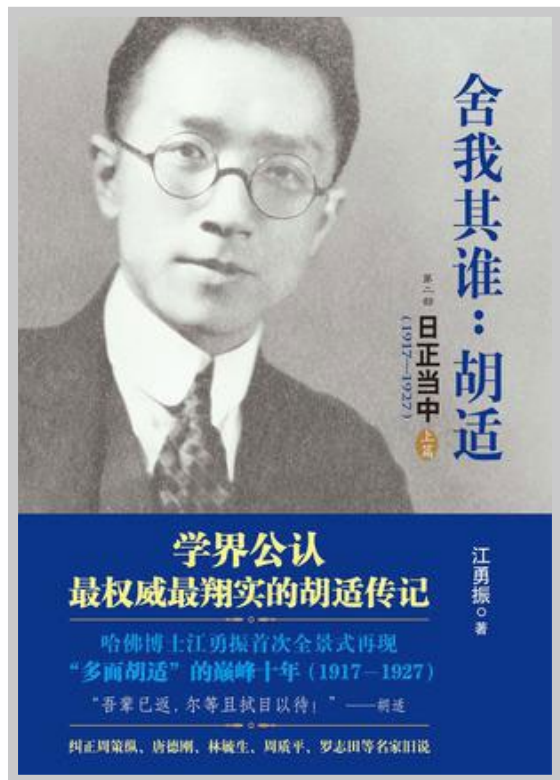
参考阅读：

Perry Anderson: Sino-Americana, London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012.

[美]孙康宜、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刘倩等译，三联书店，2013年6月。

理由：无论主编还是作者阵容，都足以让人期待，但越高期待，越多失望。暂且不说过于频繁的细节硬伤，整本书在研究范式上也很难带来新鲜感。在人文思想方面，集体的智慧有时低于个体。相比这部集体创作的结晶，我更愿意阅读这些作者们的专著。

参考阅读：



张定浩：《评〈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3年9月8日。

凌越：《史大于文的文学史》，《新京报·书评周刊》2013年11月2日。

[美]江勇振：《日正当中：胡适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

理由：这本计划中准备写五卷的胡适传记，刚刚出版时就声势浩大，第一部号称“学界公认最权威的胡适传记”，第二部号称“学界公认最权威最详实的胡适传记”。第一卷《璞玉成璧》出版后，没有读出好在哪里，以为自己判



断有问题，第二卷《日正当中》出版后，又读了一下，依然没有读出感觉。书中很多内容几乎是胡适文章和日记的拼贴，难怪写作速度可以如此风驰电掣。

参考阅读：

林宗苏：《学术打擂，“舍我其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0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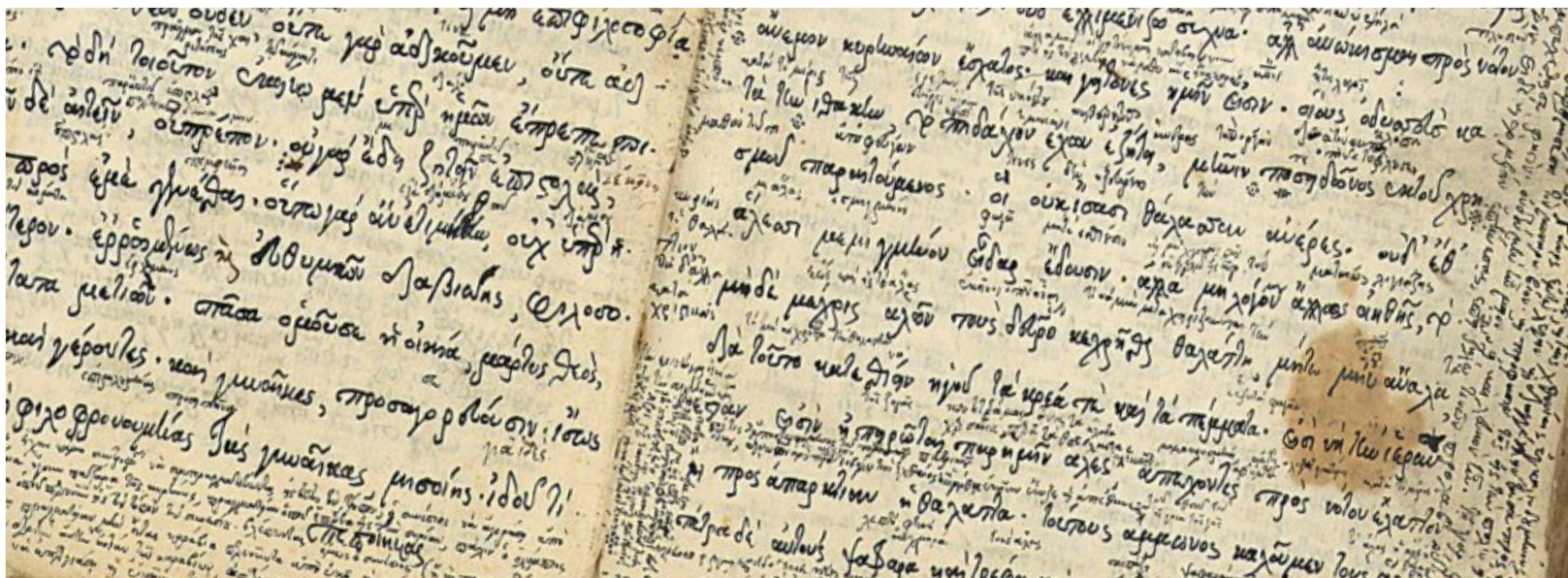
[美]许倬云：《台湾四百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

理由：这本书题目很宏大，内容（不是指页码）很单薄，这也是“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的特点。许倬云先生的学术功力，是有公认的，他撰写的历史通俗类读书，最初也颇有气象。但是，近些年他的出书速度太快了一点。按说已经到了可以缓慢的境界，却如此匆匆，不知何故。



史大于文的文学史

BOOKVIEW



凌越

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在中文版序言里即开宗明义：“《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质疑那些长久以来习惯性的范畴，并撰写出一部既富有创新性又有说服力的新的文学史。”这样的诉求应该说非常自然，在现代学术范畴里，历史早已不是那个唯一的僵化的需要被发现的“真实存在”，相反，几乎所有的现代学者都已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意识到历史有其不确定性甚至偶然性，哪怕面对同样的史料，不同的人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依然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同样，文学史作为广义的历史之一种，每一代人在打量过去的文学文本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他自己的理解。这样的认识奠定了文学史写作的某种合法性，——美国学者早就说过，每一代美国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美国文学史，——而文学经典正是在这一遍又一遍的重新打量中塑造了自己变化中的形象，尽管文学经典这个词本身似乎已经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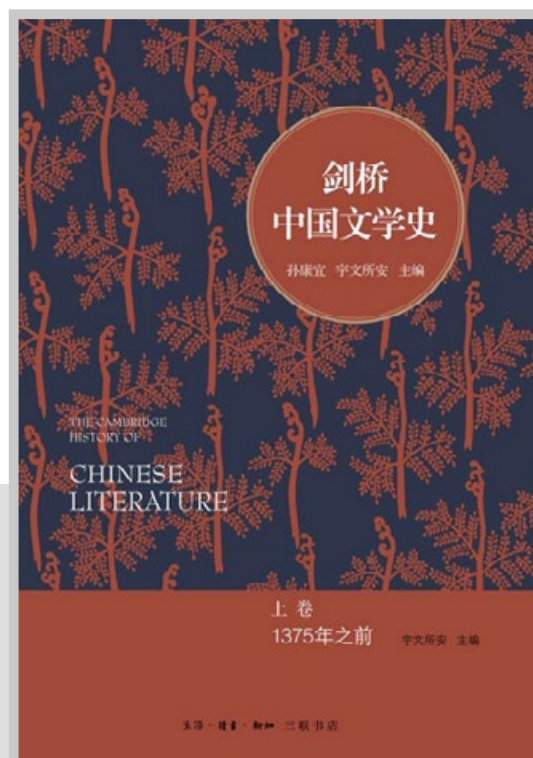
这固执的眼光中正步步向贬义词靠拢。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都是美国各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那么它自然也就带有当代美国文艺思潮的深深印记。最明显的一点是，和过去多种中国文学史相比，《剑桥中国文学史》力图突破传统的以文类为基础的叙述结构，另辟蹊径试图采用视野更宏大的文化史视角，那么当我们在书中看到“印刷与考试文化”、“宋朝都市里的娱乐”、“印刷文化与文学社团”等章节时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更真实地呈现某一时期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潜台词则是因为不断淘洗而越发精简的经典作品反倒有可能给人造成误读——对于某个时代整体文学风貌的误读。这样的初衷使《剑桥中国文学史》变得庞杂又丰富，这种印象甚至不是来自于它一百一十余万字的巨大篇幅，而是和它对于文化中各个面向主动热情地涉猎有关。在某些方面，它和历史叙述拥抱在一起，另一些

时候,它又和文化史熔为一炉。

阅读《剑桥中国文学史》,我们会不断获得很多知识,甚至是从未接触过的“文学知识”,比如在下卷里用整整一章来阐述的“说唱文学”,相信大部分读者都会相当陌生,可是同时我们又隐隐有一种不安有一种不满——难道文学史家不再需要将注意力聚焦于文本本身?不再需要给作品提供解释?以丰富人们对文章和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但是从政治领域弥漫而来的“民主意识”立刻会给这种迷茫兜头浇一瓢冷水,伴随着语言自省意识而来的怀疑论早已割断了文字和“现实”、“意义”乃至“真理”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你的判断就一定是真理,甚至于使用那种权威的语气本身都是令人生厌的。这样的思潮早已使几部晚近出现的美国文学史(《剑桥美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将部分注意力从经典作家转入寻找以往被忽略、被排除在经典文学之外的作家们。只是美国文学较短的起止时间,以及《剑桥美国文学史》超长的篇幅(8卷),使他们在关注那些之前被忽略的作家同时,依然可以用充足的篇幅来谈论狄金森、惠特曼、爱默生这样的经典作家。

《剑桥中国文学史》只有两卷,用来评述数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学史本已捉襟见肘,再分出篇幅给文化史内容、说唱文学以及更多的次要作家,那么这本书就不得不变身为概述之概述,书中论述作家很多、线索很多,但总免不了仓促简单的印记。以宇文所安撰写的上卷第四章《文化唐朝》为例,原本我对这一章寄予厚望,一方面唐朝诗歌向



《剑桥中国文学史》
[美]孙康宜、宇文所安 著
刘倩 等 译
三联书店, 2013年6月

来被视为中国文学的巅峰之一,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宇文所安几部著作——《他山的石头记》、《追忆》等——抱有好感,可是这一章读下来却让人颇为失望。宇文所安严格按照自己拟定的写作这本文学史的策略,不以文类不以单个作家诗人为单元展开论述,而是综合地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状况,如此一来,所有的唐朝诗人几乎都是被浮光掠影地提及,书中谈及李白的篇幅不足两页,杜甫稍好一点是三页,因为篇幅太短,我们更没有办法期望这本文学史可以对这两位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诗人提出某种推陈出新的看法,而对经典诗人深度地再审视不正是有抱负的文学史和批评家分内的工作吗?

一种多少有点让人厌腻的民主气氛控

制着“文化唐朝”这一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之前闻所未闻的唐朝诗人，比如女诗人李冶，她是一位女道士，有16首诗存世，但是书中并没有丝毫论及这些诗有何价值，这让人不得不猜想作者也许只是费尽心思找几位唐朝女诗人出来，以满足眼下的女性主义诉求，薛涛当然会讲到，但作者给女诗人提前安排的椅子显然还空了几把，那么李冶或许只是被勉为其难拉来占位置的，因为从行文看宇文所安自己对李冶诗歌的潜在价值也没有抱多少信心。“民主”、“平等”等政治学理念在政治进程中应该说有它们正面的意义，但是和世间万物一样，它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早就讲过，民主平等意识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但平庸则是人们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同样，《剑桥中国文学史》想要顺应这种文化领域里的泛民主化思潮，那么它也就必然得付出平庸的代价。悖论的是，因为几乎每一个唐朝诗人没有得到充分、认真的评论，编者所期望的体现总体文化思潮的预期也必然化为泡影。

当然就所有文本质量的高下而言，篇幅大概都是次要问题。当我在上文纠结于《剑桥中国文学史》分配给经典作家诗人们的篇幅太少时，肯定有人会质疑：哪怕在很短的篇幅里也是可以写出精彩的有见地的观点的。而这恰恰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另一个问题之所在。我手头正好有一套刚刚购得的米尔斯基20世纪初撰写的《俄国文学史》，它也是用相对小的篇幅处理较长时段的文学史。在涉及当代（白银时代）的作家诗人时，每位作家也多是一页左右篇幅，

但却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主要原因即在于米尔斯基敢于做出个人化的判断，也许和习见不同，但却自有道理。反观《剑桥中国文学史》，主要由描述性的知识构成（实事求是的讲，在这方面各章作者都下足了功夫），作为文学史，以文学史实的描述作为基础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对所叙述的文学史实缺少评价或者吝啬于做出个性化很强的判断（通常这种判断的高下是批评家才力多寡的体现），那么这本书就会显得缺少内在灵魂，其魅力自然也要大打折扣。还是以“文化唐朝”为例，宇文所安在对唐朝诸诗人的简短描述中少有精彩之笔，相反某些老套的判断和语言倒是触目可见。在评述白居易的诗歌时，宇文所安还体现出某种个人化的评判能力：“白居易发展出一种亲切、唠叨的诗歌风格，别具魅力。”在另一处：“读过白居易全部作品的人看到的，却只是一个在晚年不断重复自己的诗人。”但纵观全部“文化唐朝”，像这样掷地有声的句子太少了。相反，平庸的描述主导了整个“唐朝”，他这样描述王维的《辋川集》：“它们赞美了长安近郊的乡野景色、常常与佛教联系在一起的恬淡精神，也赞美了似乎弥漫于此处山水中的神性。”他这样评述杜甫的《三吏》、《三别》：“（它们）生动描写了安史之乱造成的破坏和混乱。”这些算得上中学语文考卷里的标准答案，但对于立意求新的文学史来说，如此中规中矩的评述离人们的期望还是有不小的距离。

相较于唐朝文学的章节，有关宋朝文学（北宋作者是艾朗诺，南宋作者是傅君劭、林顺夫）的章节则要出色一些，大概也是整

个两卷《剑桥中国文学史》里最偏离两位主编吁求众参与者按文化史眼光观察文学的既定要求的部分。北宋几位重要作家诗人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都被给予较充分的重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都是专节介绍。光是论及欧阳修的文艺散文，就有六页之多。评述王安石诗文的部分是十二页。评述苏轼的诗文部分是十页，随后又在专论宋词的部分又花三页来评述苏轼词作远离女性化的追求。因为有较多的篇幅做保证，这几位宋朝诗人的创作经历和观念都有可能得到较充分的展示。因为唐诗的压力，宋诗一直在找寻另一条出路，虽然没有唐诗那么自然浑成，但是其诗学观念的曲折和幽微也是颇值得玩味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这一方面着墨较多，艾朗诺这样描述梅尧臣所追求的平淡：“平淡如何成为一种诗歌理想？这只有在改革时期的价值观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语言淡而无味，才不会妨碍观念的表达。”他描述苏轼诗歌的说理倾向：“苏轼诗歌的说理成分更多是反思性的、哲学的，而非政治性的。”黄庭坚的诗风则是：“黄庭坚转而关注私人生活中的日常事件，他发现了自己的个人世界——沉浸在沏茶、社交、盆栽、艺术品等活动中，足以成为他发展自己文学才能的载体。”

“南宋文学”的作者傅君励、林顺夫遵守了全书的写作思路，没有给辛弃疾、陆游等大诗人专节介绍的机会，对于南宋的印刷文化和都市文化的重视也迥异于传统文学史，但是傅君励所著的《文与道：道学的冲击》则是全书中最有理论深度的部分，在二十多页的篇幅里，傅君励罕见地将控制整

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实的叙述抛到一边，对于诗歌究竟是出自文学史的内在资源还是源出外在经验世界——这一令众多宋朝一流诗人文人争执不休的命题，傅君励给出了充满魅力、细致入微的辨析。他精彩地指出：“陆游的外转，同时也是一种更强烈的内转。陆游的诗论与诗法，是对诗歌复杂的重新定义，以回应道学的道德基础主义。”

一部文学史的好坏，大概并不取决于作者的雄心或者结构方法的新颖，最终还得看它是如何评价它所获得的那些珍贵的文学史料，它的逻辑是否缜密，它的判断是否有勇气和预见性，它的行文是否有魅力。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艾朗诺、傅君励、林顺夫三人所撰写的宋朝文学则是最接近我所期望的文学史写作的。同样，他们也不惮对某位作家某件作品给出自己个性鲜明的判断，比如对于范成大的晚年诗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林顺夫就认为“其中颇有几首优于陶潜的田园诗”。这样的论调绝对是个人化的，想必也是需要勇气说出的，我喜欢这样的勇气，而不是令人气闷的人云亦云。

相较于《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下卷的内容大部分读者会更加陌生一些。对于陶潜、李白、杜甫、苏轼这样的经典诗人人们自是耳熟能详，甚至对于王勃、陈子昂、韦应物、孟郊这样的二三流诗人，一般读者也不陌生。可是对于元明清的重要诗人，诸如元好问、萨都刺、陈子龙、吴伟业、龚自珍等，一般读者反而相当陌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学批评从来就有贵远贱

近的倾向，对越久远的作家诗人人们更容易接受，这大约也是因为那些作家经过了更严格的经典化洗礼。晚近作家因为还没有经过严格的经典化过程，使得极少数真正卓越的作家淹没在一众平庸之辈中。披沙炼金的工作原本是批评家的天职，普通读者勉为其难也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因为五四运动一味强调文学革命、一味强调白话文学。实事求是地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气氛一直处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之下。为了凸显白话文的重要性，为了打压文言文和古文传统，五四运动诸将胡适、郑振铎等刻意营造了一个现在被广为接受的刻板的文学传统模式——即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元明清诗文原本就没有完成经典化过程，在20世纪之初又横遭一劫，那么这一时期重要作家诗人的覆没无闻也就是可以料想的了。

五四运动及其所倡导的文学革命，针对古典文学传统应该说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文学史从来就有自我反省和自我修复的功能，还没到一百年，现在五四运动本身也成为被研究和被分析的对象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那么它的局限性也就逐渐暴露出来。《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尤其是王德威所著的第六章《1841-1937年的中国文学》显示了这一文学自省的成果。孙康宜教授在中文版序言里特别提到《剑桥中国文学史》在分期上的特别考虑，“传统按照朝代分期的做法有着根本缺陷”，因而《剑桥中国文学史》尝试了不同的分期方法，例如把初唐文学和唐朝其他时段分开，并入南北朝文学。所有这些分期尝试，我以为最有学术意义的还是将五四

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和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文学合并。这个分期本身就蕴含着强烈的文学价值观的取向。在这一章开头，王德威对于习惯上所标榜的五四运动“先进”的现代性给予了某种否定性辨析：“五四运动所宣扬的现代性同样也削弱了——甚至消除了——晚清时代酝酿的种种潜在的现代性可能。如果给予历史另外一种转圜契机，这些可能未尝不会得到发展，使得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因素呈现更为丰富的结果。”这样的观念必然导致龚自珍和黄遵宪的写作重新被重视，他们的“诗界革命”也就和五四的文学革命有了对话的可能，而后者则被置于更广阔的文学视野中得到观察和评判。

但是一旦进入到对现代作家的具体评述，又让人止不住想起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这本小说史相比，《剑桥中国文学史》相应部分的评述仍然显得粗略和过于中规中矩。文学史三个字，前两个字文学占了三分之二，那么对于文学史美学意义上的期待应该算是并不过分的要求，可是《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于文化视野的一再强调则一再弱化了这一诉求。我们借由这本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包罗万象的文学史知道了每个时期活跃着不同的文人，他们缔结文学社团、印刷自己的作品，某些时候还和政治运动和变革扯上了关系。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还在读他们的作品？为什么是这位作家而不是另一位作家的作品被后人记住乃至阅读？文学史在叙述文学史实的同时能否自身也成为一部“作品”（像《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样），具备某种迷人的品质？这当然是更高的要求 and 期望，一

般来说也只会对那些认真的出色的作品才会提出这一要求,《剑桥中国文学史》配得上这一苛刻的要求。所有这些期望都是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家可以发力的空间,既然已经有这部勤勉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把文学史实部分夯实了许多。Q

被漠视、孤独不重要， 写得好才是唯一要义



朱白

2014年元月，读毕《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后，又读了《今天》第102期上的赵志明两篇小说，那种跌宕的感觉得以延续。这是读者的乐事，在你惊喜之后还有延伸和未来的期待，没有比这更对得起读者的事了。

同时，也看到微博上一则关于《今天》杂志这期小说的讨论，大概意思是北岛对于作者感到陌生，问王安忆，后者的回答看不下去。

我觉得这就太好了，是好上再叠加一层好的意思。任何对审美有点洁癖的人都会觉得，一个你在审美上否定的人对你喜欢的东西进行否定，这当然是一件对自己审美双重确认的事。譬如，我刚刚在听Fushitsusha（不失者）的新专辑，倘若这时候一个平时听凤凰传奇的家伙跑出来跟说，哎呀，Fushitsusha太好听了，我一定觉得恶心，或者对自己的审美产生淡淡的怀疑也说不定，难说进而还会对这个世界产生更加腻烦和逆反的心理。

王安忆正是写作和阅读审美双重被自己否定的人，从她《我爱比尔》之后的不多被我看到的那些创作，从她公开表达的对库切的阅读和感受（王安忆曾在某研讨会公开表示，她不明白为什么库切现在所有的故事，无论政治的还是社会的，全都把最终意义归结到性。她还发出质疑：“性本身究竟具有多少资源，有多少含义在里面，我是怀疑的，我们是否给予了太多附加的东西？人应该有很多别的材料可以挖掘，为什么大家都要盯着这个材料？”），当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她的“看不下去”一来表达自己的以一贯之的审美障碍，二来作为专家、长者和资深小说家，表达了一种高高在上且懒得在审美领域有所突破的情趣，三来则是肯定我自己的审美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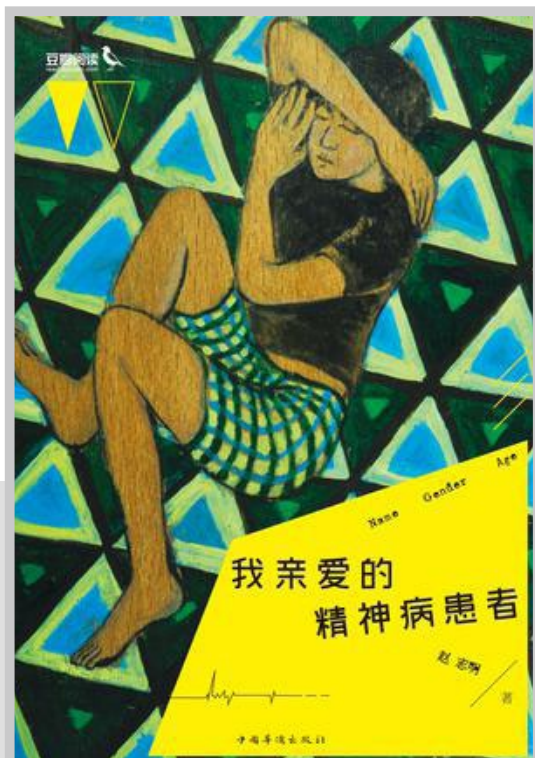
所以，我会觉得赵志明的小说无意中排斥了这种冒牌文学前辈是件好事，甚至作为商品来说，这部小说集也不需要再找什么名人名家出来搞个所谓的点拨和评语之类的玩

意了,那不但自损,也无助于这种如此优质的小说集传播——它应该给在审美上有趋同、在阅读能力上有初级能力的人看和传播。

毫无疑问,《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这部短篇小说集,是在一种汉语文学整体拙劣寒酸的气氛下,出现的真正卓尔不群的作品。这部小说集内含十四篇小说,几乎都是作者赵志明十年前的创作,其出版亦算是读者“辨认”出来的结果,此前作者的两本电子书在豆瓣上架,均得到了高人气高分的对待,其中《还钱的故事》在豆瓣阅读虚构类排行榜长期占据首位。

在离奇魔幻甚至有鬼怪出现的故事中,也是在乡间凡庸的生活场景中,赵志明不动声色地写肉身的死,也写你我随时可以感知到的那些悲剧,在一轮又一轮的生活轮回面前,在那些精致而又显得发散的魔幻情节面前,在琐碎的血缘关系和自身生理疼痛面前,那些生生死死的人间往事有一种摆脱尘世历史束缚的洒脱感。十四篇中短篇小说,归纳起来可以说它有一个关于“死”的主题,但作者不是声嘶力竭地写死的悲壮或者伤痛,而是更多地描写死后的活人的情景或与死相伴时的故事。这是一种对现实忍无可忍的写作,但却剔除了多余的愤怒和不安,带着一种气定神闲地与之互视、互玩的类似心态,平静而又离奇魔幻地将这块土地上的常态极端逼真地写了出来。

《我们都是长痔疮的人》写了三兄弟前后患上痔疮的故事,他们在父亲死后的日子里,被象征着磨难与疼痛的痔疮折磨着。大哥、二哥相继离开,家中只剩下“我”和母亲,唯独没有离开的是每个人肛门幽深之处



《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

赵志明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年12月

的那个随时可能爆发一下的痔疮患疾。哥嫂以及嫂子与母亲的片段生活场景展示,也成了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幽深却时常会显露出来的那个痔疮,它要疼痛你的神经,它要控制你的排泄功能,它要干扰你的生活节奏,是的,痔疮就如同你的一个具有神圣使命的器官,甚至切割都无济于事。

赵志明在这篇小说中,也充分展现了自己诗人的特色,他将自己垂手便可得的诗意随意穿插在小说的叙述中,在故事情节的角落中,都有他一次次诗意的展现。

另一篇堪称杰作的小说《钓鱼》,讲述了一个委婉得可以让人阅读时产生爱情、美食、奇景等等美好幻念的故事,在钓鱼的行为中,读者看到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种子真正意义上的在中国长出果实后的模样,而不

是早先那种拙劣的抄袭和致敬般地咬上三口，然后嘴一抹说自己刚才根本没吃过这块肥肉。赵志明无需动摇和隐瞒魔幻现实主义对自己小说的影响，那应该是一个全体人类意义上的珍宝和资源，谁有本事谁拿来使用。但不是你用了你就可以说拥有了，更非拙劣地用了还要试图更拙劣地掩饰，乃至发明更多的五迷三道的词来形容自己和达到撇清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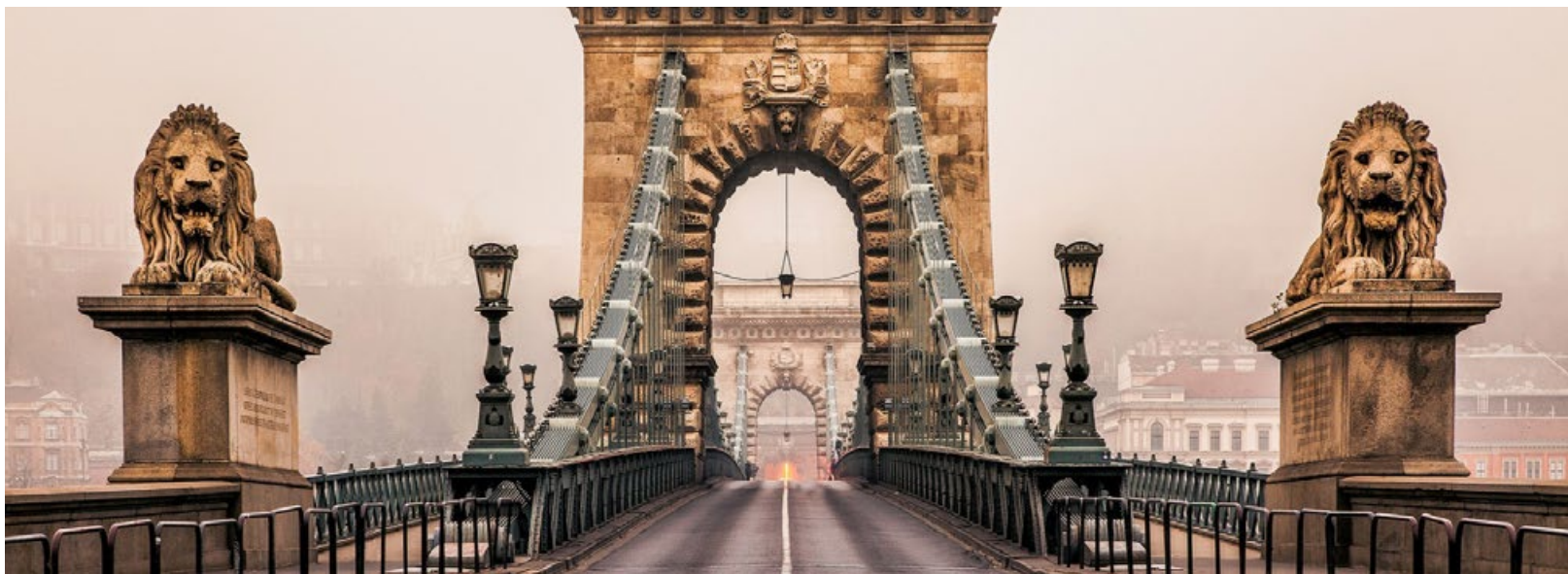
《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无需所谓名家说上两句不着四六的话，它已经足够精致和绝佳，这一点势必会在以后越来越显现出来。

我不能隐瞒自己是赵志明多年朋友的这一事实，但这不是我非要写这篇评论的理由。在目前这种世道下，最不缺少的就是肉麻和谄媚的互相抬轿行为，甚至拉来几个所谓重量级师兄文友为自己的新书新片站台吆喝，也越来越成了顺理成章的宣传学要领。可是，时间会验证诸多事物的真伪和优

劣，大多只能充当一种吵闹声音的东西，势必会被人遗忘和唾弃。甚至我为赵志明的小说喊上一声好，也不是基于这个被埋没多年的小说家终于有一部什么处女作问世之类的俗事高兴，而仅仅因为这部小说集《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太好了，被漠视、孤独不重要，写得好才是唯一要义。倘若说评论者真的有为作家和读者穿针引线的作用的话，那么我想，必须要将这样一部好的作品向大家推荐。

我甚至都觉得即便这么一部重要的小说集问世了，对于闲散自然且日常里犹如儿童一般的赵志明来说，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是他多么豁达和宽大，而是他根本没把这些诸如出版、好评、论断等等放在心里，更不会像冯小刚那样跟影评人势不两立地搞搞论战，赵志明对此的兴趣正如他写那些顺达通畅的小说，在别人眼里是技术专研、技艺磨练，可他都是顺其自然一挥而就的。Q

在布达佩斯领略“看得见的历史”



邵浴日

2011至2012学年，笔者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笔者主攻的是东欧各国在1980年代的民主转型史。在一般人看来，往事已逝，要探寻历史，似乎就只能钻进档案馆与故纸堆为伍了。但是矗立在布达佩斯街头的那些博物馆、纪念碑、雕塑以及广场公园等公共建筑，又无一不是历史的某种具象化体现，可谓名副其实的“看得见的历史”，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匈牙利完成民主化转型之后，如何实现所谓的“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即如何看待和处置本国过往那段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历史，以及如何对之前历史中的种种不正义事件进行弥补与纪念，也成为民众和政府当局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本文就想通过对布达佩斯街头那些著名景点的介绍，来为大家讲述它们背后的历史故事，以及转型正义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

国会大厦

布达佩斯位于多瑙河畔，是由历史上的三个独立城市——即位于多瑙河西岸的布达和老布达、以及位于多瑙河东岸的佩斯合并而来的。佩斯这边属于平原地形，而对岸的布达则属于山地丘陵地形，这一独特的地理条件为布达佩斯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城市景观——观光者既可以从佩斯这一侧眺望多瑙河对岸修建在山地高处的布达皇宫、马加什大教堂和渔人堡等著名景点，又可以登上布达一侧的高处，从这边俯瞰佩斯一侧的圣伊斯特凡（St. István）大教堂、匈牙利国会大厦等知名建筑。你还可以走上横跨于多瑙河之上的赛切尼链桥，此时两岸的标志性建筑皆可以尽收眼底。

在大多数国人心中，中欧地区最令人神往的城市想必属捷克首都布拉格了，笔者曾经也同样这么认为。但是当游览了这两个城市之后，笔者发现，布达佩斯作为旅游观

光城市，其魅力并不输布拉格。只是两者的风格不尽相同，如果说布拉格的气质可以用婉约与秀美来形容的话，无论就城市的格局与规划，还是代表建筑的体量与风格而言，布达佩斯的气质则可以用恢弘和大气来概括。

以各自的街道为例，布拉格市中心以小道居多，有的还蜿蜒曲折，配之以体量适中的小楼房并列于道路两旁，给人以曲径通幽之感；而布达佩斯则多是笔直而宽阔的大道，大道两旁建筑物的体量也更为宏大，其立面也多以石材为主，显得庄重而大气。再以两个城市的主水道为例，布拉格位于伏尔塔瓦河河畔，这条河的体量也要明显小于多瑙河，因此布拉格的代表性建筑之一——伏尔塔瓦河上的查理桥，其规模也要大大小于布达佩斯的赛切尼链桥。查理桥的两侧树立着30座极为精美的圣经人物雕像，桥上如今是不通汽车的，只允许行人步行通过。这使得桥上终年布满了许多露天艺术表演，以及贩卖各种手工艺品的小

商贩，俨然一条颇具风情的艺术步行街。相比之下，更宽更长的赛切尼链桥则承载了大量日常通勤的任务，桥上分为汽车道和人行道，整天都是一帆车水马龙的景象。游客在桥上感受到的不是艺术的气息，而是多瑙河及其两岸风景的壮阔。总之，对于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评价大概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个城市在各自的风格上都做到了某种极致。

好了，现在我们言归正传，开始介绍布达佩斯的著名景点吧！说实话，布达佩斯的可看之处实在是数不胜数，但是要说地标性建筑，恐怕还是要首推位于多瑙河畔的国会大厦了。它是匈牙利最为著名、也是体量最大的一幢建筑物，外表呈典型的新哥特式风格。看到这座建筑的时候，笔者立即联想到了位于伦敦泰晤士河畔的英国国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是的，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同样位于城市主水道的河畔之上，同样具有新哥特式的建筑风



貌，也同样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所在地，就连主议事厅的数量都是相同的——都是两个。

然而与历史悠久的威斯敏斯特宫不同，匈牙利的这幢国会大厦则是建于较为晚近的1884至1904年之间。与此对应的则是政治制度的不同，英国自1688年的“光荣革命”开始，即已确立起基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并成为现代议会民主制的发端。某种意义上，英国上、下议院所在的威斯敏斯特宫可谓欧洲老牌民主政体的一个象征。而近代的匈牙利则长期处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国家的独立与民主一直都是匈牙利民族致力于争取的目标。

建筑的形式往往与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息息相关，所以笔者心中便不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匈牙利的国会大厦在建筑形式上与威斯敏斯特宫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当匈牙利人于19世纪末决定开启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是否也在期待自己的国家能够成为欧洲新兴民主政体的一个代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已无法得到确切的考证了，但我们知道的是，1896年，为了纪念匈牙利人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一千周年，在当时尚未完工的这座国会大厦里召开了匈牙利国会的第一次会议。当年的人们也许未曾料到，自己的国家得以真正地实现独立和民主，要等到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1990年代了。而这幢国会大厦本身，此后也多次成为匈牙利历史的主角，并且完整见证了这个国家在整个20世纪中的跌宕起伏。

1956年事件

在介绍布达佩斯的其他景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20世纪的匈牙利历史，并重点介绍一个历史事件——“1956年事件”。关于匈牙利在一战和二战中的遭遇，以及匈牙利共产党在二战之后是如何一步步垄断政权的，笔者已经在题为《布达佩斯访“恐怖屋博物馆”》（参见“独立阅读”2012年10月——编者注）的文章中有所述及。某种意义上，匈牙利在二战后所举行的三次议会大选（时间分别为1945年、1947年和1949年），恰恰可以被视为国家走向政治专制的三个里程碑。匈共正是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取缔了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并最终于1949年囊括了所有国会席位。然而即便是在匈共确立了对于国家权力的全面垄断之后，也并不意味着实现民主的希望就消失殆尽了。由于人们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现实中发生的种种不公，以及在不堪的现实与官方的宣传间存在的巨大鸿沟，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在逐渐累积，越来越多的民众在期待着一个能够带来改变的契机。这个契机，便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

随着1953年3月斯大林的去世及之后赫鲁晓夫的上台，苏东集团内部的政治氛围开始呈现出某种“解冻”的趋势。到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东欧各国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一年的10月23日，布达佩斯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秘密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之后，这一运动更是演变为一场公开的全民革命，要求政府进

行实质性的改革，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

在此次事件中，应民众要求复出担任总理职务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伊姆雷（Nagy Imre）于10月30日通过电台向全国宣布，在取得党中央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匈牙利将从此结束一党制，恢复实行多党制，建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此后，曾被政府取缔的一些政党如小农党、全国农民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等又重新恢复了活动。在国民心中已经声名狼藉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即匈共）也随即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Hungarian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并计划进行重组。在其最新公布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委会的七人名单中，无一不是拥护纳吉政府的改革派人士。而时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也公开表达了进行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决心。如果能按照这个局势发展下去，匈牙利想必会成为苏东集团中第一个摆脱苏联模式的国家。然而不幸的是，苏联方面最终做出了进行全面军事干预的决策，派出总计12个师的兵力对匈牙利进行了全面占领，于是这场改革运动在仅仅持续了十二天之后便戛然而止了。

据统计，在自发抵抗苏军入侵的过程中，匈牙利公民总计伤亡达21728人，其中死亡2052人。纳吉等改革派领导人在苏军入侵后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避难，后来在被迫离开大使馆后被苏联人劫持，继而押送到罗马尼亚关押，最终又被押送回国内受审，以叛国罪的罪名于1958年6月16日被处决。卡达尔政府对参与1956年事件的一

大批人都进行了惩罚。1956年12月至1957年7月间，全国一共对28601人进行了审讯，对其中6211人判了刑，被判死刑者达298人。之后还陆续判处了一些人，前后总共有将近500人被判处死刑。整个匈牙利民族在1956年事件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此后，匈牙利民族又不得不在苏联人



的强制下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呆了三十多年，直至1989年的东欧剧变才得以最终挣脱苏联体制。不用说，1956年事件作为改革的先声，已然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次集体记忆，而匈牙利在1989年所实现的体制突破，也是与1956年事件息息相关的。譬如时任国务部长的匈共高层领导人波日高伊·伊姆雷（Pozsgay Imre）在1989年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宣布，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历史小组委员会”在对历史进行重新调查之后，认定1956年事件是一次“人民起义”，而非卡达尔时代所宣称的反革命事件。此举彻底公开了匈共党内高层所具有的分歧，也成为匈共内部实现进一步分化的导火索。此后，匈共当局同意于1989年6月16日——即纳吉被处决的31周年忌日举行对纳吉及其同伴的重新安葬仪式，这个日子的日益临近也给当时的匈共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并最终迫使其同意与反对派开展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正式谈判。这样在距离纳吉的国葬仪式举行仅剩3天的6月13日，匈牙利全国圆桌会议谈判正式开幕，从此开启了国家通往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和平进程。正因为如此，对于1956年事件的正名与纪念，便成为匈牙利在剧变之后实现“转型正义”的一种重要方式。

科苏特广场与自由广场

国会大厦西面临河，正门在东面面对佩斯的这一侧，而在正门的前方，就是布达佩斯的一个著名广场——科苏特广场。1848年3月15日，匈牙利民族在科苏特·拉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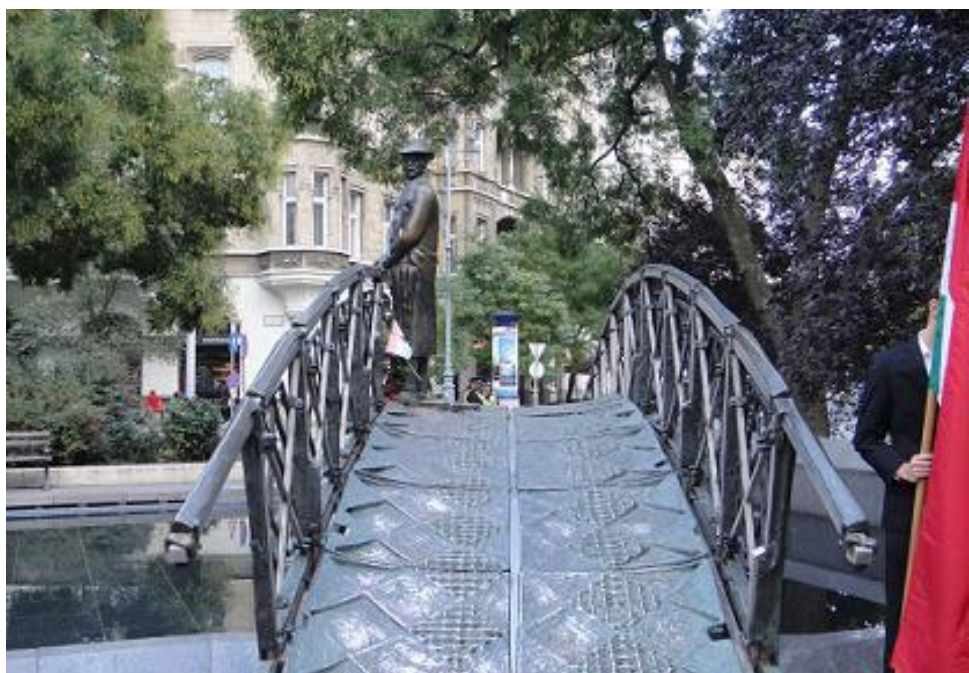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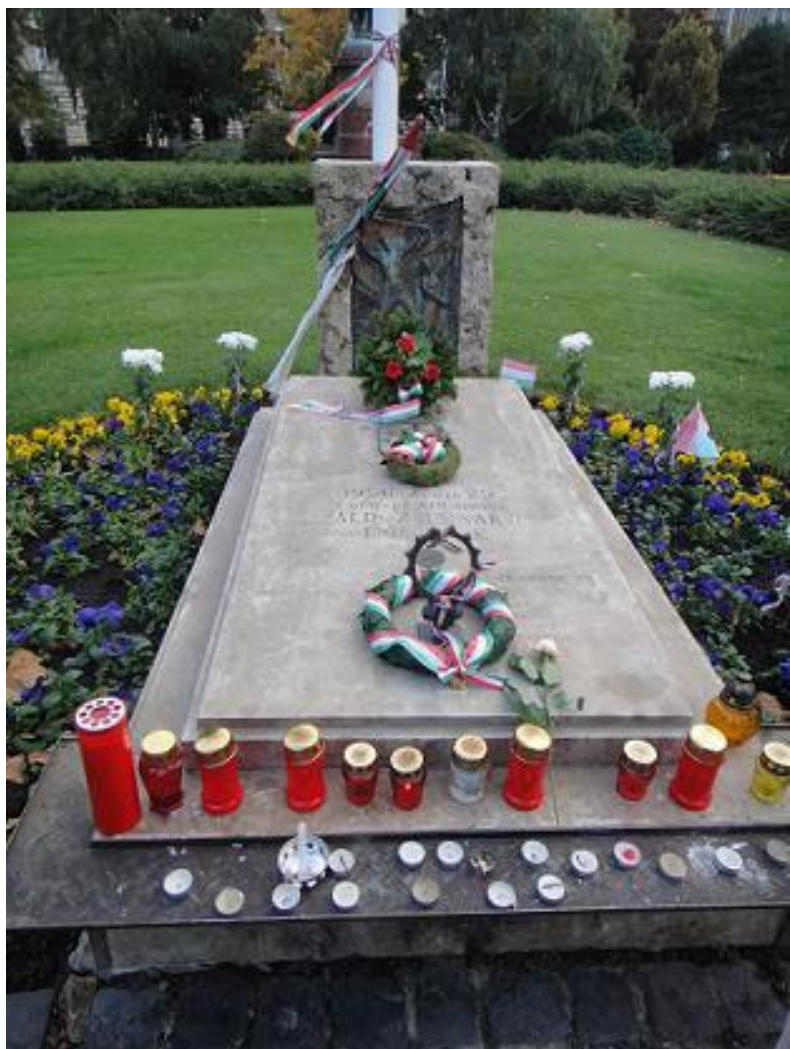
什（Kossuth Lajos）的领导下爆发了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起义，要求奥地利帝国确立以英国模式为模板的宪法和国会，并且通过选举产生匈牙利政府。虽然其后被奥地利和俄罗斯联军迅速予以镇压，但是1848年革命也已然成为匈牙利民族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一个象征。而这个广场，就是以当年革命的领导人科苏特的名字命名的。

在如今科苏特广场的北面，矗立着一座黑色大理石纪念碑，纪念碑正面雕刻着匈牙利国徽，国徽下刻着一个年份——“1956”。石碑的上方有一个火炬，火焰熊熊燃烧，终年不灭。这便是剧变后匈牙利政府所建立的1956年事件纪念碑。



在广场的南面，则安置着一个象征性的墓碑，用来纪念1956年事件中发生在这个广场上的一件惨案。科苏特广场的西面是国会大厦，东面则是农业部大楼。1956年10月25日，当人们在这个广场上集会的时候，突然从农业部大楼的房顶上射来了密集的机枪子弹。广场上即刻死伤枕籍，尚未中弹的人们惊恐地到处寻找藏身之地。然而隐藏在房顶的机枪仍在疯狂地扫射，甚至还瞄准了已经趴倒在地上躲避的人们。

苏联在10月24日就已经派出了一批部队开进布达佩斯市区以图控制局势，因此有一些苏军的坦克和士兵当时也在广场上。一些懂俄语的布达佩斯市民还在尝试着与他们交谈，向他们解释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苏联士兵对来自房顶的突然袭击显然也毫无准备，其中还不乏有人中弹倒地。苏军



的指挥官眼看着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手无寸铁的市民遭受机枪射击而接连倒在血泊中，感到射击者实在过分，于是便下令坦克向楼顶上的射击者开炮。在苏联坦克的介入下，这场大屠杀才得以停止。

事后的诸多证据都表明，该惨案的罪魁祸首就是国家保安局。原来他们早就在广场周围的建筑房顶上驻扎了装备有重机枪的部队，那天当广场上出现大批群众的时候，他们以为是来冲击国会大厦的，于是出于保卫政府机构的“职责”，他们向人群开了枪。然而这天究竟是哪个人下令开的枪，却一直没有查明，这也成了1956年事件中众多的悬案之一。在这次惨案中，有近百人被打死，受伤者更是不计其数。一开始是用救护车运送死伤者，后来因为不够用，便用公共汽车和卡车来运。这些车辆经过的马路上留下了长长的血迹，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而如今广场上的这座墓碑，就是用来纪念那天的遇难者们的。看到墓碑上雕刻的日期“1956年10月25日”，以及那个臭名昭著的英文缩写“AVH”（国家保安局），你的耳边仿佛也响

起当年的枪声，眼前也仿佛呈现出当年人们四处逃散的惨烈场景……

离开科苏特广场不远，在农业部大楼的南侧，有一座青铜雕塑，描绘的是纳吉手扶栏杆站在一座桥的中央。这其中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原来，桥的一侧象征着共产党体制，另一侧则象征着人民的利益，而桥下的水域则预示着两者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纳吉在整个1956年事件中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表明他已然挣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走到了桥的中央。而他的头完全扭向了桥的一侧，则预示着他的心已经完全落在人民这边，他还将坚定地朝人民这一侧继续走下去。虽然苏联的军事干预阻止了他的脚步，但是他所做出的选择却已定格成这样一个画面，化作永恒。在东欧剧变之后各国纷纷推倒或移除前共产党领导人雕像的背景之下，纳吉的新雕像却在匈牙利的土地上树立起来，令人不禁感叹历史自有她的审判。

往纳吉雕像的东南方向走一小段，就会到达布达佩斯的另一个著名广场——自由广场（Szabadság tér）。该广场建于19世纪末期，之前这里驻扎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军队军营。它之所以被命名为“自由广场”，便是因为对那些奥地利军营的移除象征了匈牙利民族对于自由的不懈追求。该广场的东西两侧分别矗立着两幢规模宏大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匈牙利国民银行大楼和前股票交易大楼（共产党于1948年关闭了这里的股票交易，并将这座大楼改用作国家电视台总部）。

在广场中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矗立着

一座苏联式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战后用来纪念在1944至1945年的匈牙利解放战争中所牺牲的苏军士兵的。无论是其顶端的五角星，还是其碑身镰刀加锤子的标记，又或是标记下面雕刻的俄语和匈牙利语的纪念文字，都在时刻彰显着它与共产党时代的渊源。然而与市内其他纪念碑不同的是，它的周围设置有一圈栏杆，路人因此根本无法靠近这座纪念碑。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共产党政权崩溃之后，越来越多共产党统治时期的真相被发掘出来，人们了解到自己当年所受到的欺骗，加上自身及亲友在那个时代所遭受的种种不公，难免会对共产党时代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产生厌恶之情。更有甚者，一些人还会自发去破坏或拆除共产党时代的那些雕塑与纪念碑。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要用栏杆将这座纪念碑“保护”起来了。事实上，这也是如今布达佩斯



城内唯一一座保留在原地的共产党纪念碑了。那么当年那么多的雕塑和纪念碑都哪里去了呢？全都被民众拆毁了么？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述及这个话题。

离这座苏式纪念碑不远，树立着一位西方领导人的雕像。只是这位领导人比纳吉要幸运得多，他不仅公开向社会主义阵营发出了挑战，还亲身见证了共产党体制的崩溃以及苏东集团的解体，他便是美国第40任总统一一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众所周知，如果没有里根和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的积极行动，苏东集团恐怕还将苟延残喘更久的时间。当年美国与其西欧盟国一方面向苏东集团各国的共产党当局施压，另一方面向其国内的政治反对派提供道义支持与物质援助，为东欧各国实现体制变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匈牙利政府在布达佩斯市中心为里根树立这样一座铜像，想必也是为了对其表示感谢与纪念。

里根是一位极具感染力的领导人，而这座铜像也十分传神地展现出了他的风采——身材高大的里根西装笔挺，正意气风发地迈步向前，极为符合他开朗而平易近人的性格。在铜像的一旁，还设有一台多媒体显示器，如果路人感兴趣，可以在触摸屏上点击读取里根的相关信息——从他的家庭出身，到他担任总统期间所施行的内政外交政策，可谓无所不包。而在没人点击的时候，这个大屏幕就会恢复到封面状态，那是一张里根笑容满面的照片，配上一句简短的说明——“罗纳德·里根：一位击败邪恶帝国的乡村牛仔”。里根铜像的周围没有任



何保护措施，游客们可以径直走上前去，握着总统的手与之合影。而里根面前不远处的那座苏式纪念碑如今却备受冷落，还要用栏杆围住以防止市民破坏，历史的审判在这一鲜明的对比中已然表露无遗。

英雄广场与阅兵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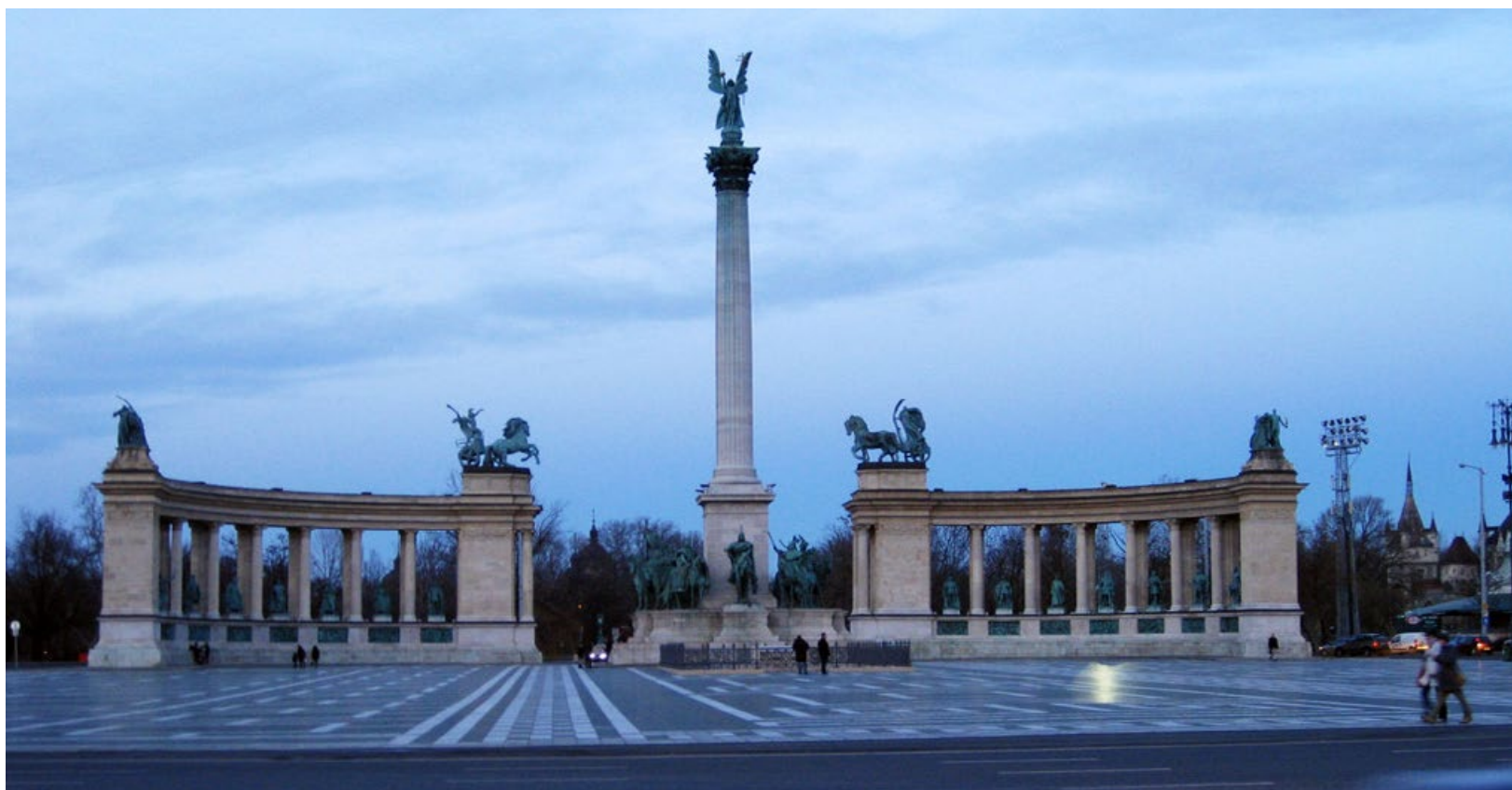
在安德拉什大街的最北端，是布达佩斯另一个极为著名的广场——英雄广场（Hősök tere）。该广场是为纪念匈牙利民族在欧洲定居一千年而于1896年开始建造的，完工于1929年。广场的中心矗立着高36米的千年纪念碑，纪念碑的顶端是天使长加百利的雕像，他左手持使徒时代的双十字架，右手高举匈牙利王冠，俯瞰并守护着这座城市。碑座平台上是当年率领匈牙利民族

来此定居的7个部落首领的骑马青铜像。在纪念碑的前方，是一座为纪念匈牙利历代民族英雄而建的象征性石棺，建于一战之后，棺盖上刻着如下文字：“为了我国人民的自由和民族独立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在纪念碑的后方，是两座高达16米的弧形柱廊，柱廊间矗立着14位匈牙利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统治者雕像，每个雕像的基座上都刻有他们的名字和在位年代，下面还有一幅反映其主要功绩的浮雕。广场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精美的古典建筑，分别是匈牙利国立艺术画廊和国立美术馆。广场的北面则是美丽的城市公园，而号称欧洲最大的温泉浴场——赛切尼温泉浴场（Szechenyi Strandfürdő）便坐落在其中。

英雄广场十分开阔，可以容纳20万人，同时因为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所以也常常被用作举行各种仪式的场地。譬如在共产党时代，该广场就常常被用作外国元首正式访问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场地。然而在1980

年代末期，当局却被迫在这里举办了一场令其十分尴尬的仪式——对纳吉及其同伴的国葬仪式。

前文提到，纳吉于1958年6月16日被政府以叛国罪的名义处决了。他的尸体先是被埋葬在中央监狱内的墓地里，后来又于1962年被秘密移葬到离此不远的市政公墓301号墓区。当局对于纳吉墓地的具体位置一直讳莫如深，显然是想极力避免民众的自发悼念活动。然而到了1980年代末，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以及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匈牙利社会要求为1956年事件和纳吉进行平反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就连匈共党内高层的一些领导人也持同样的立场。匈共当局不得不接受于1989年6月16日举行国葬仪式的要求。国葬仪式原定在布达佩斯公墓举行，然而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负责国葬仪式筹备工作的历史正义委员会（TIB）以及纳吉家属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在公墓举行这场仪



式，而是要求改在市中心的英雄广场举行！

匈共当局再次被迫接受了这个要求。6月16日，国葬仪式如期举行，当天有数十万民众自发在英雄广场和301号墓区参加了这场国葬仪式。政府高层领导人如总理内梅特·米克洛什（Németh Miklós）等人也亲自为死难者守灵。匈共当局派代表在国葬仪式上做了发言，呼吁整个社会不要因为历史的不公而产生对立，而应当采取一种全民和解的立场。反对派的领导人也作了发言，对匈共当局拖延开启政治谈判的做法进行了谴责，并且呼吁匈共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切实地推动国家民主转型的进程。

这场国葬仪式对于匈牙利民众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连共产党官方都承认纳吉当年的路线是正确的，那么国家未来该走向何处，就是不言自明的了。该仪式对于匈牙利的民主转型进程来说，也是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历史和民众如今都已经站在了反对派这边，再拖延下去对匈共当局只会更加不利。于是在5天后的6月21日，由匈共当局、反对派政党以及第三方社会组织参加的全国圆桌会议谈判正式开幕。三个月后的9月18日，谈判宣告完成，各方就民主转型的基本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1990年3月25日，匈牙利举行议会自由选举，最终确立议会民主制政体。

顺便提一下，在恐怖屋博物馆参观流程的最后阶段，参观者会经过靠近楼梯的一个小房间。在房间周围的墙壁上，挂着三个显示屏，分别循环播放着三段视频：一段是当时恐怖屋博物馆的开幕仪式，另一段记录

的则是最后一名苏联士兵撤离匈牙利国土时挥手告别的场景，还有一段便是当年英雄广场上的纳吉国葬仪式。笔者觉得这三段录像都不容错过，因此当时是逐个看完之后才转身离开的。

在英雄广场东面不远的地方，曾经还有个在共产党时代地位举足轻重的广场——阅兵广场（Felvonulási tér）。广场的中心建有一个苏联式的阅兵台，阅兵台的正面雕刻着抽象的“人民”群像。在阅兵台高处的基座上，曾放置着一座高8米、重达几十吨的斯大林青铜像——足蹬长靴的斯大林站在高高的基座上，抬起右手小臂指着前方。每逢重要节日，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便会在这个广场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在1956年事件中，这里也发生了一件颇具戏剧性的故事。

时间回到1956年10月22日，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因为受到波兰改革进展的鼓舞，于当晚在布达佩斯工业大学召开了一次大会。会议达成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决定于次日即10月23日举行支援波兰人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其后这场游行即成为1956年事件的开端；二是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主要就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改革以及实现民族独立这三大问题提出了16条具体的操作方案，如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共产党员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出其各级干部、由全体公民通过自由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一个由多党参加的新国民大会、吸收专家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造等等。这些要求虽然十分明确，但显然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然而，其中有一条似乎要容易办到得多——“我们要求尽快拆除作为斯大林主

义暴政和政治压迫象征的斯大林雕像，用1848至1849年争取自由的英雄和殉难烈士的纪念碑取而代之。”

10月23日这一天，便有人自发地这么做了。傍晚时分，有一群示威群众来到阅兵广场，试图推倒这座全国最大的斯大林雕像。在这之前，已经有人将一个大牌子挂在了斯大林的脖子上，上面写道：“俄国人，你们走时可别把我丢下！”到这里来的多是产业工人，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他们先是在雕像上套上钢缆绳，想用拖拉机和卡车把它拉倒。但由于雕像非常的沉重和坚固，他们的多次努力都宣告失败。后来有两个工人找来电焊工具，在一阵蓝色火焰和片片火花闪过之后，铜铸雕像的两膝部分眼看着越来越细。这时他们再套上钢索去拖，雕像终于从基座上倒栽葱般地倒落到地上，人群也随之发出一片欢呼。人们兴奋地用卡车把它拖到位于市中心的民族剧院附近，七手八脚地用电焊枪把它的头部割下，接着又有人在上面涂上了“厕所”的字样。而阅兵广场阅兵台的那个基座上，这时只剩下斯大林的一双俄国大靴子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据说这一景象后来保持了几个月之久。

在之后的卡达尔政府时代，当局并没有试图恢复这座雕像，而是顺势移除了基座上那双残存的靴子。然而该广场的阅兵作用还依然如故，每年仍会上演几出热闹的仪式。剧变之后，广场逐渐无人问津，匈牙利政府如今则将其改建成成了一个露天停车场。一位朋友在游览时知晓了它的历史，笑着感叹道：“那些阅兵式看上去虽然热闹气派，却只是专制政府的面子工程，为了满足少

数独裁者的利益和喜好而已。如今改建的停车场虽然冷清，但终究是用到了人民身上呀！”笔者也不由得发出感慨，曾经的集权制度虽然号称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却恰恰缺乏防止其干出误国害民的坏事的纠错机制。难怪如今的匈牙利民众选择放弃了表面辉煌的阅兵式，而宁愿接受冷清的停车场啊！

纪念雕塑公园与国家博物馆

前文提到，共产党时代的那些雕塑和纪念碑，如今留在原地的只剩下了那一处。可是我们知道，共产党政权是特别热衷于以象征性的雕塑和纪念碑来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当年布达佩斯街头的这类雕塑和纪念碑一定也不在少数。那么如今它们都哪里去了呢？事实上，这不仅是匈牙利曾经面对过的问题，也是所有实现了民主转型的东欧国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如今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环境都正变得日益自由和开放，一方面，当年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各种历史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对于共产党时代的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的反思也在逐渐深入。尤其当人们有了在两种不同制度下生活的切身体会之后，更是清楚地认识到了两者的优劣。不得不承认，如今东欧各国的绝大多数民众对于曾经的共产党体制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因此如果那些多如牛毛的具有典型共产主义印记的雕塑和纪念碑都留在原处，多少会引起人们的反感，甚至会使他们联想到那个时代的谎言、暴力以及无处不在



的压抑氛围。因此多数国家都会选择将它们从原处移除。

但是移除之后又该如何处置呢？有人主张对之进行公开销毁，这些人认为，就好像当年它们所具有的象征性功能一样，如今对它们的公开销毁也同样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即以此表明与旧制度的一种决裂，并且让旧制度带给民众的恐惧与怨恨，随着这些东西的湮灭而一起消失，从此投入到全新的生活当中。然而另一种意见却认为，不仅不应当对之进行销毁，反而要将他们收藏起来，善加保管。这样一方面可以保留历史的原貌，不至于割裂历史，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历史教材，提醒人们只有时刻记得那段不堪的历史，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日子中不再重蹈覆辙。匈牙利便是后一种主张的践

行者。

1991年，布达佩斯市议会决定用一个地方来集中放置共产党时代的雕塑和纪念碑，于是便建起了如今这座纪念雕塑公园。公园位于布达佩斯西南近郊的萨巴特卡大街（Szabadkai utca）与巴拉特尼大街（Balatoni utca）的交叉口附近。它还被当地的旅游手册列为了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因此虽然位置有些偏远，但却很容易获得相关的交通路线。除了可以通过乘坐公交抵达之外，还有一个更为便捷的直达方式——每天上午11点，在市中心的戴亚克广场（Deák Ferenc tér）上都有一班直达巴士开往这座公园，下午1点再来公园将游客接回戴亚克广场，可谓十分方便。笔者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抵达公园的。



还没进入公园，笔者就被公园大门正对面的那个阅兵台给吸引了，因为那上面不是别的，正是斯大林留在基座上的那双俄国大靴子呀！原来这正是当年阅兵广场上那个阅兵台的复制品，而基座上残留的靴子作为一种象征，更是成了这座复制品的最大亮点——它既象征了共产党体制的黑暗与恐怖，同时又体现了匈牙利民族对这个体制的抗拒以及对自由和民主的不懈追求。用这双靴子来作为雕塑公园的注脚，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公园内陈列有四十多座那个时期的各种雕塑，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以匈牙利191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人库恩·贝拉(Kun Béla)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士的雕像等。参观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公园入口处的纪念品商店买一本英文版的导览手册，里面详细介绍了公园内每座雕塑背后的一段故事。

这里重点介绍一座苏联士兵像的故事。如前所述，多瑙河西岸的布达一侧属于山地丘陵地形，多是低矮的山丘和高地，其中最高的那座小山丘是海拔140米的盖莱特山(Gellért Hill)。在这座山的山顶，匈牙利政府曾遵照苏联占领当局的旨意于1947年建起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苏军对于匈牙利的“解放”。纪念碑的主体是一位站在高达22米基座上的身高13.5米的女性铜像，她双手高举着一片代表着自由的棕榈叶，俨然成了布达佩斯的“自由女神像”。在她的前方，还有一个高7米的基座，上面放置着一座手持红旗的苏联士兵铜像。其左右两侧还分别放置了两座分别象征着进步与战胜邪恶的

人像雕塑。盖莱特山顶本就是布达佩斯的制高点，这里是俯瞰城市全景的最佳地点，如今树立起的这座总高达35.5米的纪念碑，立即成了城市新的制高点，可以说在布达佩斯市区的几乎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眺望到这座“自由女神像”的身影。

然而到了1956年事件的时候，那座苏联士兵像也被民众自发推倒了。而这座“自由女神”像却得以幸存。这其中似乎蕴含了某种预示——民众对自由依然充满了向往，但是对那些自诩能带来自由的占领者却充满了厌恶之情。当苏联出兵进行镇压之后，政府于1958年在原处又重新放置了一座当年苏联士兵像的复制品。直到匈牙利剧变之后，这整个纪念雕塑群的去留问题才再一次回到了台面上。当时存在两种意见，一些人认为应当将整个雕塑群全部移除，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只需要移除其中那些令人不快的部分就可以了。最后第二种意见占了上风，政府只移除了那个苏联士兵像，以及“自由女神像”基座正面那个中间刻着共产党党徽的金色五角星。

至于这个俯瞰全城的“自由女神像”，也在1992年举行一系列文化活动的期间被盖上了一块白色绢布。数天后绢布被移除，象征着对于“自由女神像”的重新揭幕。从此，她得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象征。在女神像被绢布盖住的期间，她看上去就像一个白色幽灵，于是在不少人看来，绢布的移除也象征着匈牙利民族终于彻底摆脱了共产主义的幽灵。而那座被移除的苏联士兵像，如今就陈列在这个雕塑公园当中。

我们知道，除了镰刀加锤子的共产党党

徽，红色五角星也是共产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它们在共产党国家里可谓随处可见。

匈共统治时期的布达佩斯也不例外，无论是国会大厦的圆顶上，还是渔人堡的城堡顶端，又或是各个政府大楼的房顶上，反正只要是重要的公共建筑，上面都能看到一个金属制成的红色五角星。在赛切尼链桥的布达一侧，有一个标志着布达佩斯所有道路起始点的“零公里标志”，标志前方有一个大花圃，政府还在花圃里用红色鲜花拼出了一个号称全国最大的五角星标志。而在如今的雕塑公园中央，也重现了当年的那块花圃，中间用红色鲜花拼出了一个五角星标志，只是体量要比当年小了很多。匈牙利剧变之后，那些五角星标志自然都被统统移除了，所以这里恐怕是如今为数不多的能够见到红色五角星的公共场合了吧！

公园门口还有一排平房，也是个小型博物馆，里面展示着与共产党时代相关的一些物品，如当时的报纸、海报等等，参观者可以从中了解到当年人们的生活情况。此外还有个放映厅在循环播放着一部叫做《一个特工的生活》的影片。在卡达尔政府时代，政府的内务部拥有自己的电影制作室，他们在此期间拍摄出了多达一百多部影片，用来培训政府的秘密警察人员。2004年，匈牙利导演帕普·加博尔(Papp Gábor)对这些影片进行了甄选与剪辑，制作出了如今这部影片。观众从中可以看到当年的秘密警察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来监控人们的生活的——比如如何安装窃听装置、如何在主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房屋搜查、如何招募秘密警察人员以及告密线人、以及如何建立有

效的情报搜集网络等等。

如果想要更为完整地领略匈牙利的历史，那么有一个地方是绝对不容错过的，那便是位于市中心博物馆大街(Múzeum körút)上的匈牙利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幢气势恢弘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始建于1837年，完工于1847年，是匈牙利历史最悠久、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展览主要以时间的演进为轴线，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了国家的历史进程。展览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二楼展厅主要陈列的是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896年匈牙利人定居为止的考古展览，三楼展厅则主要展示了此后直到20世纪末的匈牙利历史。

在参观20世纪历史展览的时候，匈牙利各个时期的海报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海报色彩鲜明、设计独特，或是描绘了某个历史事件，或是向民众传达着某种号召。不同政治派别的海报在这里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对比，譬如如果你将极右的箭十



字党（纳粹党）和极左的共产党的海报放置在一起，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两个政治色彩看似南辕北辙的政党，其海报的风格却如此相似！如果海报上没有标明政党标记的话，一般人恐怕还真难辨别它们究竟出自哪派之手。

当代史的展览自然也少不了1956年事件的主题展厅，在其中笔者又邂逅了那座斯大林雕像的遗迹——他那只被摔破的左手！从它的尺寸及残破程度来判断，想必这一定是“真品”了吧！这里还展示了当年在街头战斗的市民所穿着的衣服、民众从墙上自发拆除的以苏联领导人命名的路牌、以及当年的一面被挖去苏式徽记的匈牙利国旗，旁边还放着那个被挖去的苏式徽记。笔者当时在布达佩斯已经呆了一段时间，但无论是从历史照片中，还是在参观其他历史博物馆的时候，看到的都只是被挖去苏式徽记的国旗，心中难免会好奇那个徽记究竟长得啥样，这次终于窥见真容啦！徽记中心是一把锤子和一根麦穗交叉，其上有一个红色五角星，左右两边还是麦穗，下面是飘扬的匈牙利三色旗。且不论其中所含有的政治意义，仅从美学的角度，你就不得不承认它很不讨人喜欢，仿佛生来就是注定要被人挖去似的。

市政公墓

前文提到，纳吉被处决之后，其遗体曾长期被埋葬在市政公墓301号墓区的一个普通墓碑之下，当局将具体的埋葬地点

列为机密，以防止民众发起悼念活动。然而即便如此，从1970年代开始，还是有一些民主反对派人士开始自发地将鲜花放置于这个墓区周围。他们的举动似乎在提醒官方——纳吉究竟埋在何处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已经永远留在了人们心里。在1989年6月16日的国葬仪式之后，纳吉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了这个墓区。后来，这块墓区和紧邻的300号墓区都被用作了1956年事件殉难者的专属墓地。

笔者在访学期间，也特地去拜访了市政公墓。它位于城市的东南近郊，虽然稍微有些偏远，但仍然可以乘坐公交抵达。该公墓是由当时的政府当局于1886年新辟了一大块土地建立的，因此本地人又将它称为新公墓。墓区规模宏大，总共占地超过3平方公里。在寻找301号墓区的过程中，笔者算是亲身领略了公墓的规模，因为其主入口在西边，而301号墓区却在最为偏远的东北角上，这意味着要穿过整个公墓才能抵达！真让人不禁感叹当年共产党政府的良苦用心。所幸如今在通往目的地的一路上不断能看到明确的路牌指引，笔者的心中才少了一些忐忑，否则万一迷路的话，能否抵达目的地还在其次，是否回得去正门都是个问题！在足足走了40分钟之后，笔者终于到达了301号墓区。

在走到301号墓区之前，首先会路过它南边的那块墓地，其间树立着一座现代风格的雕塑作品，这是由当代著名的匈牙利雕塑家约万诺维奇·乔治（Jovánovics György）设计的1956年事件英雄纪念碑，象征着通过炼狱的通道。再往北走就是

301号墓区了。纳吉的墓碑就位于该墓区的东南角上，上面刻着简单的文字——“纳吉·伊姆雷，1956年的匈牙利总理”。在纳吉墓碑左侧，安置着一座无名烈士墓碑，用以纪念所有那些未能埋葬于此的无名殉难者们。

在301号墓区的其他地方，以及其西侧的整个300号墓区内，则密密麻麻地竖立着当年那些殉难者的木制墓碑，每个墓碑的头部都系着一根匈牙利三色旗的彩带。在这两个墓区内还竖立着数个大理石石碑，上面雕刻着所有埋葬于此的殉难者的名字，同时还标有每个人埋葬的具体位置。在300号墓区的小道入口处，矗立着一座由1956年参战者协会捐建的象征性木门，上面刻着这样一句话：“只有匈牙利人的灵魂，才能够穿过这座大门。”

笔者拜访公墓的这个日子，并非什么特别的日子，连双休日都不是，但是却依然看到纳吉墓碑以及旁边的无名烈士墓上堆满了一束束朴素的鲜花，看来在笔者之前，已经有不少人来过了。笔者甚至需要用手轻轻地拨开覆盖在其上的花朵，才能完整地拍摄到墓碑上的文字。在共产党时代，这里其实已经埋葬着一些当年殉难者的遗体，但是直到剧变发生之前，都由官方指派的民兵队把守着，不允许普通人轻易靠近。而在如今的匈牙利，任何人都有来此悼念的自由，墓碑上更是一年到头鲜花不断。面对着一排排的墓碑，笔者心中竟突然感到一丝慰藉——是的，面前的这些匈牙利灵魂呀，你们如今可以安息了！

“国庆日”

1989年10月6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14届代表大会。10月7日，该党宣布其从此将放弃对于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接受由圆桌会议谈判协议所确定的民主政治规则，同时宣布自身从即日起改组为匈牙利社会党（Hungarian Socialist Party），开始为参与接下来的议会大选做准备。10月23日，即1956年事件33周年的日子，时任国家总统苏洛·马蒂亚（Szörös Mátyás）在科苏特广场上向民众宣布，匈牙利将放弃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国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而改名为“匈牙利共和国”。至此，匈牙利民主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在历经了整整33年之后，历史终于还给了这个民族一个公道。

在如今的匈牙利，每年的10月23日都是国家最为重要的纪念日之一（另外两个重要纪念日分别是1848年革命纪念日3月15日和圣伊斯特凡一世创建匈牙利王国的纪念日8月20日）。2011年10月23日，笔者便有幸在布达佩斯亲身体验了这个国庆日的独特氛围。

事实上，整个纪念活动从10月22日就已经开始了。笔者那天路过科苏特广场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国会大厦挂上了中间被挖去苏式徽记的匈牙利国旗。而广场上的1956年事件纪念碑以及10月25日遇难者纪念墓旁边，也已经放满了点燃的纪念蜡烛。这天下午，官方在附近的纳吉雕塑旁举行了纪念仪式，来自官方和民间的代表向纳吉雕像敬献了花圈。晚上，科苏特广场上还举办了露

天的纪念演唱会，引来无数路人驻足观看。此时，1956年事件纪念碑顶上那熊熊燃烧的火炬更显得愈发耀眼夺目，仿佛要燃起每个人心中对于自由的渴望。演唱会结束之后，笔者在回家路上再次路过纳吉雕像，看到那座桥的栏杆上也已经被人们挂满了鲜花和花圈，纳吉的面容掩映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那样平静而慈祥，使人心中充满了温暖的力量。

到了10月23日，各种纪念活动更是遍布了布达佩斯街头。无论在英雄广场、市政公墓还是科苏特广场，都聚集着大批参加纪念活动的民众。各种与1956年事件相关的墓碑和纪念碑前都堆满了鲜花与蜡烛。纪念活动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举行集体悼念活动，有的是组织露天的演讲和诗歌朗诵，还有的组织起历史图片展览，又或是在室内或露天设置放映室，为人们播放相关的历史影像，有些民间团体还自发组织了游行队伍，沿着当年学生们的游行路线重新走一遍……

笔者得知这天早上在国会大厦门前将举行重要的纪念仪式，于是早早便来到科苏特广场守候。早上11点整，仪式开始，国会大厦的正门徐徐打开，一队身着匈牙利传统军装的官兵庄严地迈步走出，中间的一位士兵手捧一面旗帜。当他们在国会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列队完毕，身后的乐队奏起军乐，这队士兵便开始有节奏地将那面折叠的旗帜逐步铺开，最终将它展现在人们面前——果然，那正是一面中间被挖去苏式徽记的匈牙利三色旗！仪式只持续了短短十多分钟，但是却庄严肃穆，象征性地展示了那段沉重

的历史。下午，国会大厦向民众免费开放参观。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平时的国会大厦只在每周的一、三、五各提供两次由工作人员带领的参观机会，每次持续半个小时左右。而这次却是自由参观，可以有侧重点地去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地方。据笔者所知，这样的机会一年好像只有这一次。

总体来说，“国庆日”的纪念活动自然有其庄严肃穆的一面，但是也并非全是沉重的氛围。譬如那天晚上的音乐会，除了表演创新的民族传统音乐之外，还有摇滚乐队登台献唱呢！再比如在那些主要的纪念活动场所旁边，不少餐厅老板也来此搭起了露天的美食摊。人们要是肚子饿了，可以随时选购一些匈牙利的传统食物来品尝，又或是买一杯极具匈牙利特色的热葡萄酒端在手中，与友人边喝边聊，倒也十分惬意。

的确，如今的匈牙利民众，大概已经迈过历史的那一页了。旧制度已经不复存在，新制度虽仍有诸多不尽完善之处，但民主制度的要义便在于它虽不完美、却具有自我完善与纠错的机制。其所具有的开放心态，使人们能够了解自己的过去，铭记过往的历史，进而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在如今的布达佩斯街头，这些“看得见的历史”可谓随处可及。它们不仅在预示着这个民族历史的丰富与深厚，同时也彰显了她的开放与智慧，使这座千年古城时刻彰显着令人无法抗拒的永恒魅力。

参考资料：

1、Barbara Olszanska, Tadeusz Olszanski (2011), Eyewitness Travel:

Budapest, 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2、László Baják, István Ihász (2008), the Hungarian National Museum History Exhibition Guide 4: the 20th Century, Budapest: Tibor Kovács.

3、Ákos Réthly (2010), In the Shadow of Stalin's Boots: Visitor's Guide to Memento Park, Budapest: Premier Press.

4、Mária Schmidt (2008), Terror Háza: House of Terror, Budapest: Adu Press.

5、宇平：《穿越布达佩斯》，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

6、[美]乔治·索罗斯：《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宋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

7、侯凤菁：《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Q





钢铁大亨弗雷尔的夫妇私人书票
肯特(美国)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問題，敬請來信告知。
獨立閱讀討論區：<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